

中華佛學學報第 8 期 (pp.273-314) : (民國 84 年),
臺北 : 中華佛學研究所, <http://www.chibs.edu.tw>
Chung-Hwa Buddhist Journal, No. 8, (1995)
Taipei: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ISSN: 1017—7132

台灣佛教史前期

釋慧嚴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提要

生長在台灣的人不可以不知道台灣這塊土地的歷史，這已經是目前大多數台灣人共有的認識。由此筆者想到身為台灣人的佛教徒，實有必要了解台灣佛教的歷史。基於如此的認識，促使筆者嘗試著〈台灣佛教史〉的寫作。

首先筆者選擇以明清時代的佛教，作為研究的領域，這是從縱的面，也就是從時間的流程，來探討台灣佛教的來源。另一研究的領域，是以江南、福建的佛教，為探討的對象，這是從橫的面，也就是從地域來看台灣的佛教，如此大概可一窺擁有四百年歷史的台灣佛教。本論文，首先介紹學界對台灣佛教所作的時代區分說；其次探討佛教的傳入及其源流。關於佛教的傳入台灣，是以考察台南四大古剎中的竹溪寺、彌陀寺的創建年代，及福建僧侶參徹法師來台主持赤山龍湖岩、興建碧雲寺、大仙寺的經緯，來作為判定的依據。致於其源流，則以日本統治時期，日本人來台的見聞及總督府的宗教調查報告書為本，理出鼓山涌泉寺、黃檗山萬福寺的宗派屬性及其信仰內容。再其次，是研討滿清時期成立的開元寺、法華寺及黃檗寺，其在滿清統治時期的沿革及其僧侶活動的情形。但因篇幅限制，本論文僅介紹至法華寺，至於黃檗寺及僧侶的活動，則留到台灣佛教史後期中發表。

關鍵詞： 1.台南四大古剎 2.禪宗流派 3.福建湧泉寺 4.禪淨雙修
5.媽祖信仰

一、前言

生存在台灣這塊國土的民族是多種的，所以台灣的文化也是多元的。雖然來自原始住民及漢民族的文化成分佔大多數，尤其是漢民族文化中，福建、江浙一帶的文化又較其他地區多。但不能否認的是來自上述地區的文化，移植到台灣之後，長期與原住民如平埔族的文化，相互激盪影響而融合的現象是不可忽視的。加上日本統治台灣的 50 年間，日本文化對台灣文化的影響，也是今日我們要了解台灣文化時，不可不納入思量空間的因素。從此角度來看台灣佛教的話，首先必須把四百年來台灣的佛教史，作時代上的區分，然後依照所區分的時代，來探討該時代佛教界的動向及民眾的信仰型態。又因為台灣的佛教信仰，依時代先後，它受了福建、日本及江浙三大地區佛教的影響，因此我們對這三大地區佛教的信仰型態，必需要有基本的認識。基於如此的需求，本文在必要時，也追溯了上述三大地區的佛教信仰，以便更能了解這多元化的台灣佛教。

一、時代區分

台灣佛教史的時代區分，有如下五種說法：

(一) 李添春說：

- (1) 明鄭時期 (1661~1682)
- (2) 清朝時期 (1683~1895) [1]

(二) 王世慶說：

- (1) 荷西竊據時期
- (2) 明鄭時代及清代
- (3) 日據時期
- (4) 光復以後[2]

(三) 張曼濤說：

- (1) 台灣初期
- (2) 日本統治時期
- (3) 日本戰敗後[3]

(四) 梁湘潤、

p. 275

黃宏介說：

- (1) 明代

- (2) 清代
- (3) 日據時代
- (4) 光復後[4]

(五) 邢福泉說：

- (1) 荷蘭時期（1624～1661）
- (2) 鄭氏時期（1661～1683）
- (3) 滿清時期（1683～1895）
- (4) 日本時期（1895～1945）
- (5) 中華民國時期（1945～目前）[5]

以上五種時代區分說，並沒有明顯的理論，只是隨著統治者的更迭而加以區分。此中，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王世慶主纂，民國 60 年出版的《台灣省通志》卷 人民志·宗教篇，是依據該委員會主編、李添春纂修，民國 45 年定稿的《台灣省通志稿》卷 人民志·宗教篇而來，故其年代說可能是來自第三章佛教序說而來的吧！[6]不過《通志》強調是以時代的宗教政策來區分的。筆者認為，可以從佛教變革角度，採納其區分說。

二、佛教的傳入及其源流

一、佛教的傳入——明鄭三寺——

佛教傳入台灣的確切年代，可從文獻說及推論說兩方面來作探討。從文獻來說，佛教傳入台灣的確實年代雖不能確認，但是在永曆十五年（1661）十二月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福建省泉州、漳州、福州及廣東省惠州、潮州兩地人民大量移居台灣，閩粵一帶的佛教也隨之傳入，在明鄭時代先後有了竹溪寺、彌陀寺、龍湖巖三座名剎，聳立於南台灣的史實，[7]可以作探討。今從文獻說，先將相關史料及研究文獻列舉於下：

p. 276

- (一)、《台灣府志》[8]（《高纂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
竹溪寺：在府治東南數里許，其間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最為勝景。良辰佳節，騷客遊人多會於此。
彌陀室：在附郭之東，庭宇幽靜，佛像莊嚴，傍植檳篁，名苑芬馥，可供遊□。龍湖巖：在諸羅縣開化里，陳永華建，環巖皆山也，前有潭，名「龍潭」。潭之左右列植楊柳、桃花，亭內碧蓮浮水，蒼檜摩空，又有青梅數株，眾木茂榮，晚山入畫。真巖居之勝境幽僻之上方也。
- (二)、《重修台灣府志》[9]（《周纂府志》）卷 9，外志·寺觀（附宮廟）：
以上三寺與右載相同。
- (三)、《台灣縣志》[10]卷 9，雜記誌·寺廟：

彌陀寺：邑東郊外也，年久傾圮，僧徒散去，僧一峰至自武彝山，有志重興，托跡偏廂募化，以供香火。五十七年監生董大彩建中殿一座。五十八年僧鳩建閣君殿於西偏，暨僧房六間，東偏三官殿則監生陳仕俊倡義，首襄其事焉。

竹溪寺：距邑治二里許，徑曲林茂，溪流環拱，竹木花果，堪稱勝致，匾其山門曰：「小西天」。

(四)、《諸羅縣志》[11]寺廟及古蹟：

龍湖巖：在開化里赤山莊，偽官陳永華建。

(五)、《重修台灣縣志》[12]卷 6，寺宇：

竹溪寺：在永康里康熙三十二年建，顏曰小西天，徑曲境幽，清溪環抱，有竹木花果之勝，香燈田坐尖山莊，計一十二甲。

p. 277

彌陀寺：在大東門內永康里。偽時建，歲久傾圮。康熙五十七年監生董大彩鼎建中堂。五十八年武彝僧一峰募建西堂及僧房，監生陳仕俊倡建西堂。有寺田（坐鳳山縣嘉祥里阿嚏甲、尾園一所），載租穀七十二石，又園一所（坐寺後）里人黃士甫、曾享觀捐置。

(六)、《重修台灣府志》[12]（范纂府志）卷 19，雜記·寺廟：

竹溪寺：距邑治二里許。徑曲林幽，清溪環拱，竹木花果，頗稱勝概；顏其山門曰：「小西天寺」。寺田在尖山莊一十二甲，年收租粟為香火。

彌陀寺：在東門內永康里。年久傾圮；康熙五十八年僧一峰至自武彝募化重興。寺田在鳳山縣嘉祥里阿嚏甲尾園一所，年收二十二石；又寺後園一坵，黃士甫，曾享觀置為本寺香火。龍湖巖：在開化里赤山莊。偽官陳永華建（閩人謂寺為巖）。環巖幽邃，前有潭、名龍湖；中植荷花，左右列樹桃柳。青梅蒼檜，遠山浮空，宛入圖畫。

(七)、《台灣通史》[14]卷 22，宗教志·佛教：

彌陀寺：當是時東寧初建，制度漸完，延平郡王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於東安坊延僧主之，殿宇巍峨，花木幽邃，猶為郡中古剎。

龍湖巖：其後諮議參軍陳永華師次赤山堡，以其地山水迴抱，境絕清淨，亦建龍湖巖，巖即寺也。蓋當鄭氏之時，台灣佛教已漸興矣。

又該通史卷 22，宗教志·台灣廟宇表：

彌陀寺：在大東門內，明延平郡王鄭經建。康熙五十七年，里人董大彩修。五十八年，武夷僧一峰募建西堂，里人陳仕俊復增建之，殿宇寬敞，花木幽邃，為郡治冠。

竹溪寺：在大南門外，康熙三十年建。徑曲林幽，清溪環拱，頗稱勝概，顏其山門曰：小西天。乾隆五十四年，里人蔡和生倡修，嘉慶元年重修。

龍湖巖：在縣轄（嘉義縣）赤山堡六甲莊。鄭氏時，諮議參軍陳永華建。其前有潭曰：龍湖。花木幽邃，稱勝境。乾隆元年，六甲莊人文超

水，漆林莊人蔡壯猷募款重建，並祀延平郡王。

- (八)、《台灣文化志》[15]卷中：
彌陀寺：引《台灣縣志》

p. 278

云：傳現台南城彌陀寺為鄭時草創。

龍湖巖：引《諸羅縣志》云：在赤山堡（七甲庄）的赤山巖傳為鄭經的諮議參軍陳永華所建。

- (九)、《台灣省通志稿》卷2，人民志·宗教篇：
各種寺廟亦隨漸建設，東寧物質建設外，各種制度亦略完備。延平郡王鄭經，以承天府之內尚無叢林，乃命建彌陀寺於東安坊，此是佛教寺院之嚆矢。其後諮議參軍陳永華師次赤山堡，以其地方山水迴抱，環境亦絕對清淨，乃捐建赤山龍湖岩，延請福建僧伽參徹法師來主持。
- (十)、《台灣名勝舊蹟誌》：[16]
竹溪寺：係清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八年間台灣府知府蔣毓英所建。
彌陀寺：係鄭成功之子經，以本島沒有一名刹為憾，為奉佛祈福，創建的所在。
- (十一)、《台灣懷舊》[17]（1895～1945）：
一)、竹溪寺：築於明朝永曆十五年～十八年間（1662～1665），為台灣最早的一座寺院，與開元寺、法華寺、彌陀寺齊名，為台南四大古刹。

由以上諸史料看來，明鄭時代三座佛教寺院成立的年代先後，出現了相異的說法。從《台灣名勝舊蹟誌》、《台灣通史》、《台灣省通志稿》、《台灣省通志》都記載為彌陀寺，是鄭成功之子鄭經，以承天府內無佛教寺刹為遺憾，而建彌陀寺於東安坊。且《通志稿》更有「此是佛教寺院之嚆矢」的說法，所以有台灣第一座寺院是彌陀寺的說法。如此的說法，是起因於早期史料的《高纂府志》、《周纂府志》、《范纂府志》、《台灣縣志》，對明鄭時代三寺成立的年代，沒作確切的記載，加上《名勝舊蹟誌》的彌陀寺說，係依失實的調查報告，而《通史》採信其說所致。今將盧嘉興氏的〈台南古刹彌陀寺〉[18]及〈再談台南古刹彌陀寺〉[19]兩篇研究文獻，所作的結論轉述於下：

古刹彌陀寺在日據時，曾經日人依照調查誤記是「鄭成功之子鄭經以東寧無奉佛之所而建」

p. 279

；但正確的考證，乃是由洪姓施主獨資捐建，[20]不過因為規模不大，所以當時稱室而不稱寺，名為彌陀室。[21]迨隸清後，到了康熙五十八年重建擴充已具規模，始改稱為彌陀寺迄今。

又盧氏於民國60年7月23日，根據現任彌陀寺住持圓斌法師所提供的日據時代依照原舊錄牌位轉錄的如下總錄牌位：

臨濟正宗示寂沙彌信實彌公覺靈蓮座

住持彌陀寺沙門正麟贊化禪師覺靈

欽命巡臺察院兼理學工科給事中大檀樾主大老爺單諱德謨蓮座。

重興本室按察副使道管臺灣府事檀樾主蔣公諱毓英星君

重興開山第一代圓寂比丘傳臨濟正宗三十八世戒然張公果生大禪師蓮座

開建本室信官洪諱元弼檀樾主星君

臨濟正宗新房分派順寂沙彌友慧法師蓮座

重興彌陀寺圓寂沙門一參通公禪師蓮座

順寂沙彌志忠鴻公倪蓮座

臨濟正宗順寂沙彌振宗敬公蓮座

彌陀寺住持真宗本派石公以能蓮座

考究出台灣隸清後第一任知府蔣毓英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來台蒞任，至二十八年陞任江南按察使為止，曾修葺再興彌陀寺的史料，證明彌陀寺是創建於明鄭時代，因為鄭克塽降清，是在永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的緣故。又創建彌陀室的，確是如嘉慶十年「重建彌陀寺碑記」所載的洪氏，其名為元弼，當時不名為彌陀寺而為彌陀室，是因為規模較一般寺院為小的緣故。不過創建的年代，雖知是在明鄭時期，但不知確切的年代。然而由蔣毓英於康熙二十三年重興彌陀室，延聘臨濟正宗第 38 代戒然禪師（俗姓張名果生）為開山第一代住持來推算，彌陀室的興建當是康熙二十三年以前的事。

又盧嘉興氏於〈再談台南古剎彌陀寺〉中，對戒然禪師以後的彌陀室沿革，作了如下的敘述：

p. 280

三十一年經第三任台灣縣知縣王兆陞附建彌陀室書院[22]（有塑像奉祀）。嗣因年久失修傾圮，僧眾無法維持，陸續散去；適有一峰禪師自武彝山來臺，有志重興，足跡徧街市，托鉢募化，以供香火。康熙五十七年（1678），監生董大彩重建中殿一座，五十八年一峰禪師鳩建閻君殿於西邊，暨僧房六間，而東邊三官殿是監生陳仕俊所倡導，

首襄其事。經這一次的重興擴建，規模宏大，就改稱為彌陀寺。置寺田，在鳳山縣嘉祥里阿噠甲尾（現高雄縣阿蓮鄉甲尾）園一所，年收粟七十二石；又寺後園一坵，係黃士甫、曾享觀所捐置的，充為這座寺的香燈。乾隆三年（1783）漢巡臺御史單德謨（高某人，丁未進士，乾隆二年任，主科試，留任一年，轉江南鹽驛道——《重修台灣縣志》卷9職官志）捐修（有奉祀祿位）。嘉慶四年（1799）董事黃鍾岳（即黃拔萃——筆者）等鳩眾重修，至十年（乙丑，1805）竣工，經泐碑分為兩石立於山門外邊左右兩旁。[23]咸豐八年（1858）三月經住持正麟禪師和董事石長益捐募鑄銅鐘。日據時充為新豐郡役所，迨至民國十二年（日本大正12年，1923），歸還信眾，那個時候敗瓦頹垣，淒涼滿目，管理人黃茂笙、谿荃兩昆仲及住持王兆麟等目擊心傷，就倡議捐募修建，於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動工，十八年竣工，由清時廩生胡殿鵬，字子程，號南溟撰碑泐石。光復後雖屢有修葺，但四周環境因寺地多經出租或被佔建，逐漸陷於雜亂無序，殿宇亦已腐朽不堪，自圓斌師住持就以重建為己任.....

以上盧氏的研究報告，係依牌位總錄，《台灣縣志》、《重修台灣縣志》、《范纂府志》、《重建彌陀寺碑記》及自己的見證而來。又依昭和4年（1929）秋立的「彌陀寺重修碑記」，[24]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自明鄭時代，走過明治時代的兵燹，大正時代被官方佔為衙門之用至今，在圓斌比丘尼經營下[25]彌陀寺沿革。其次，談到竹溪寺的沿革，筆者也是要藉用盧氏的研究。

根據上列《重修台灣縣志》的話，它是建於康熙三十二年（1693）；《名勝舊蹟誌》

p. 281

則記載為康熙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間，台灣第一任知府蔣毓英所創建；《通史》則說是康熙三十年。由此看來，竹溪寺的創建年代，有以上三種說法。不過根據《台灣縣志》，我們可以知道，竹溪寺，原本名為小西天；《高纂府志》則告訴我們，竹溪寺位在承天府治的東南方數里的地方，寺院所在林木蒼鬱，溪徑紆迴，景色幽美，每逢良辰佳節，必有文人騷客觸景而興，留下許多詩詞。這些詩詞是提供資料給我們，讓我們得以解開上述疑題的最佳史料。此中，沈光文與鄭氏官吏唱酬之詩：

沿溪傍水便開山，我亦聞之擬往還；

一日無僧渾不可，十年作客幾能閒；

書成短偈堪留寺，說到真虛欲點頑；

正有許多為政處，僅將心思付禪關。

在此詩前，有註云：

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26]。

沈光文，字文開，號斯庵，浙江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福王元年（崇禎十七年，1644），預於畫江之師，授太常博士。永曆五年（清順治八年，1651）十一月，與沈宸荃（慈谿人，崇禎十三年進士）由潮陽泛海抵廈門、金門閩督李率泰方拈來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公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公遂留閩，思卜居於泉之海口，挈家艤舟南日山，過圍頭洋口，遭風，飄至台灣北部。[27]後來輾轉於永曆六年（1652）初到赤嵌居住。十五年（1661）鄭成功克台灣，知道光文在台灣大喜，以客禮見；而遺老亦多入台，各得相見為幸。王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贖之。

p. 282

至鄭成功薨，子經嗣位，頗改父之臣及政，光文不滿鄭經所作所為，遂於十七年作《台灣賦》一篇，賦中有「鄭錦（即鄭經的乳名）僭王」[28]之句寓諷。十九年光文因寓諷之賦受讒，幾至不測。乃變服入山為僧，法號紹光，結茅羅漢門山中，所以有〈普陀幻住菴〉之作：

磬聲飄出半林間，中有茅菴隱白雲；

幾樹秋聲虛檻度，數竿清影碧窗分；

聞僧煮茗能留客，野鳥吟松獨遠群；

此日己將塵世隔，逃禪漫學誦經文。[29]

後來有人向鄭經解釋，才能免於難。羅漢門山外，有目加溜灣者，番社也。光文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曾嘆曰：「吾廿載飄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而卒不克，其命也夫。」已而經卒，諸鄭復禮公如故。[30]以上是沈光文的略傳，由於沈光文的詩與竹溪寺的創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分析其所作的詩的內容及其生平，是解開竹溪寺創建年代的關鍵。

永曆十九年，沈光文變服為僧，潛入羅漢門山，結普陀幻住菴以居。此普陀幻住

p.

283

據毛一波氏撰「試論沈光文詩」所指，係是日後的大岡山的超峰寺，[31]逃禪

漫學誦經文」之句，可以證明沈光文結茅菴於羅漢門山時，即落髮為僧，直到永曆三十七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灣隸清，尚以皂帽黃衣渡餘年。由此可以證明「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之詩，是作於永曆十九年以前，且從「僅將心思付禪關」來看，也可以知道此時的沈光文尚未出家。「十年作客幾能閒」，說明光文於永曆六年移居台南，至鄭成功據台相見為止，十年間為生活奔波勞困的情形。[\[32\]](#)而「州守新構僧舍于南溪」中的州，當是指天興州、萬年州。根據《高纂府志》卷1，封城志·沿革中云：

成功就臺灣土城居之，改臺灣為安平鎮，赤嵌為承天府，總名東都；設府曰承天府，設縣曰天興縣、萬年縣。未幾，成功死。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拒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歸誠。經嗣立，改東都為東寧，改二縣為二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興市廛、構廟宇，招納流民，漸近中國風土矣。

由此沿革，可以知道天興縣（嘉義）、萬年縣（左營）升格為州，是在鄭經的時代，也就是永曆十七年三月鄭經改東都為東寧的時候。關於這件事，盧嘉興氏在〈台灣第一座寺院竹溪寺〉中介紹盛成教授〈沈光文研究〉中的「成功平臺之後，設承天府，下設二州：天興州與萬年州」（伊能嘉矩《台灣文化志》卷下第14篇拓殖沿革第一章第274頁）之說，且盛成引《文化志》而說天興州、萬年州的設立是在鄭成功的時代，因此盧氏判斷竹溪寺係建於永曆十五年的時候。同時指出在彌陀室創建以前，已有規模較大的寺院存在了。至於《通史》所記載「鄭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實是出於缺乏當時的資料所致。不過《文化志》的原文是：

父子三世二十二年（自明永曆十六年，即康熙元年，至永曆三十七年，即康熙二十二年之間），就南部和蘭人的遺址建承天府，設安平鎮，別於北路置天興，南路置萬年各縣（後陞為州），立鎮開屯。同時招徠閩之漳泉、粵之惠潮的流民，

p. 284

大闢草萊。

由上文看來，將天興、萬年兩縣升格為州，並沒有明確的年代。但是依《高纂府志》及《台灣紀略》[\[33\]](#)的記載，可以確切地知道，那是永曆十七年鄭經任命翁天祐為轉運使，擔任國政時候的事。此時的沈光文也任職於承天府，所以有「正有許多為政處」之句。由此推測竹溪寺是建於永曆十七年至十八年之間。可是盧氏依盛成教授研撰的〈沈光文研究〉中的：

竹溪寺相傳為鄭省英建（府志），省英為芝莞長子，於永曆十五年十二月（1662年2月）繼楊朝棟為承天府尹。天興州守為莊文烈，永曆十五年五月任，萬年州守為祝敬，同時任。天興位於承天府即今台南之北，萬年位於其南。祝敬為首任萬年知州。是年十二月初六日

(1662年1月25日)與朝棟以小斗散糧，剋扣軍旅為成功所殺。順治十八年十二月初三日，已是西元一六六二年一月二十二日，是時荷蘭已降。成功先於是時在城置第宅，寺之構成，當亦於是時。當時光文已知成功將殺北人楊朝棟與祝敬，故云：「人多往遊，余未及也。」且詩中多規勉之處。.....

而作了如下的結論：

由以上的解說來看，竹溪寺係建於永曆十五年的時候。就可以明瞭彌陀室創建以前已有規模較大的寺院存在了。《台灣通史》所記「鄭經以承天之內，尚無叢林乃建彌陀寺」實在出於缺乏當時的資料所致。如以成功於永曆十五年二月改赤嵌地方為東都明京，設一府二縣，以府為承天府，縣為天興縣及萬年縣。楊戎政（即楊朝棟，經任五軍戎政）為府尹，委莊文烈知天興縣，祝敬知萬年縣事，改大目為安平鎮。那個時候的建制是萬年縣而非萬年州。於十八年三月鄭經返台，始改東都為東寧，改二縣為二州的記載（不過鄭經改制，是在八月），[34]以這一首詩的詩題所記的州官是改制後來講。.....如竹溪寺的興建年代因詩題所記州守與盛成教授的解談有出入時，應興建於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的時候，而落成於改制直後了。

根據以上的研究來作總結的話，盛成氏是主張永曆十六年而不是盧氏說的十八年。

p. 285

至於盧氏依據《台灣紀略》沿革中的記載主張是在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時，即永曆十七年；落成於鄭經改制後不久即永曆十八年。如此的主張正與筆者的推測相同。如此看來《通史》的康熙三十年說、《舊蹟誌》的康熙二十三年起至二十八年間說，都是有誤，倒是《台灣懷舊》之說較符事實。

又詩中的南溪，因為位於承天府城之南邊故名。由於此溪沿畔綠竹成蔭，風景宜人，所以在鄭克塽降清以前已被騷客稱做竹溪了，[35]因此寺名也隨溪名而更改了。原本被取名為「小西天」，[36]在隸清之後，就已被稱做竹溪寺了。關於此寺以後的沿革，可參考如下盧氏的研究：

乾隆五十四年（1789）里人蔡和生倡修，煥然一新，至嘉慶元年（1796）黃鍾岳等再募捐重修，嘉慶二十三年董事劉廷貴復修。光緒十二年（1886）候補通判鮑復康重修。迨民國二年（1913）竹溪寺的管理人上官玄、林神等，以寺內沒有住持，那個時候遇捷圓上人由國內的涌泉寺受戒歸台，上人立志堅定，勤苦精修，弘揚佛法，不遺餘力，經管理人等決議聘上人為竹溪寺的住持.....。十六年，改建竹

溪寺為中西折衷式。捷圓上人於民國 37 年農曆 3 月 4 日圓寂。由上人的高徒眼淨師繼承住持，眼淨師於少年的時候，畢業臺北佛教中學，即往廈門入南普陀山閩南佛學院，後渡日本京都臨濟學院深造，因德高望重，徒眾興旺。[37]

眼淨法師於民國 60 年圓寂，曾開辦佛學院，致力於教育，因眼淨師出自開元寺，所以竹溪寺隸屬於開元寺派。

至於明鄭時代創建的龍湖巖（今台南縣烏山頭珊瑚潭），其確切年代，見諸史料（前揭）

p. 286

並不清楚，但從《高纂府志》已有記載一事來推測，是創建於明鄭時代，決無疑問，而且各史料均記載為陳永華（？～1680）建置。因此了解陳永華的生涯，當可推知龍湖巖創建的年代。

陳永華字復甫，福建同安人。父鼎，以教諭殉國難。在延平郡王鄭成功於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薨，在台將領主兄終弟及而擁成功之弟世襲；但是金門、廈門諸人主父死子繼而擁成功之子經繼之。在此叔侄爭權之役中，陳永華為諮議參軍，於十月輔佐鄭經率軍入台，靖內亂後，鄭經嗣位。十七年正月隨鄭經回廈門。十八年三月隨經撤退回台灣，八月鄭經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為州。十九年八月，鄭經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深得鄭經信任，授任為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勸諸鎮開墾，栽種五穀，蓄積糧食，插蔗煮糖，廣備興販，于是年大豐收，民亦殷足。又設立圍柵，嚴禁賭博，教匠取土燒瓦，往深山伐木斬竹，起蓋廬舍，與民休息。教民就瀨口地方，修築丘塚，潑海水為滷，曝曬作鹽，上可裕課，下資民食。永華見諸凡頗定，啟經建聖廟，立學校，以收人材。二十年正月，孔子廟落成，三月立太學，以永華掌學院。二十八年三藩事發，鄭經得耿精忠書邀約，舉兵會師廈門移駐泉州，加永華東寧總制使留守台灣。國事無大小，悉由永華主之。永華胸藏韜略，約束法嚴，衛旅勇肅，境內大安，所以夜戶不閉，百姓樂業，籌運軍糧五、六年，西征之師沒有匱乏。三十四年西征之軍敗北回師澎湖，監國克□與留守東寧總制使兼管勇衛事陳永華率諸文武士庶，請鄭經回台。後永華墮馮錫范之計，三月將收轄部旅交劉國軒，越數日逝。[38]

盧嘉興在〈台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中，根據陳永華的傳略，指出陳永華創建龍湖巖，是身為東寧總制使，留守台灣的時期，即永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之間（康熙十三年～十九年，1674～1680）。不過筆者以諸史料都冠「諮議參軍」之職稱；《通史》言及師次赤山堡；《台灣外志》記「十九年八月，鄭經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勇衛，益加心思不惜勞苦，親歷南北二路各社，……向鄭經建議建聖廟，立學校，以收人材」，等陳永華在政經建設略有成果之後，著手文教建設的實績來看，龍湖巖的興建可能是在永曆十九年至二十年的時期吧！

關於龍湖巖興建的年代，尚有如下三種說法：

(一)《通史》卷 22，宗教志·台灣廟宇表·碧雲寺條中云：

在嘉義縣轄哆囉嘓堡（新營的蕃社）之火山，康熙十四年永曆二十九年，

p. 287

1675），僧參徹自福建來，住錫龍湖巖，偶至此地，以其山林之佳，遂闢茅結廬，奉龍湖巖之佛祀之，朝夕誦經，持戒甚固，附近莊人，乃謀建寺，曰大仙巖。嗣命其徒鶴齡居之，又建一寺於玉案山之腹，後祀如來，而前奉延平郡王神位。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月參徹沒，眾葬之寺前，建浮屠。五十六年，邑人洪志商募修。嘉慶二十四年，子爵王得祿重修。

(二)《通志稿》卷 2，人民志·宗教篇第三·佛教：

其後諮議參軍陳永華，師次赤山堡，以其地方山水迴抱，環境亦絕對清淨，乃捐建赤山龍湖岩，延請福建僧伽參徹法師來主持。而參徹和尚又於嘉義火山（關子嶺），新建碧雲寺，命其徒鶴齡法師為住持，此是僧伽來臺之發端。

(三)《通志稿》卷 1，土地志·勝蹟篇·大仙寺條：

清康熙四十年（1701）間，福建高僧參徹禪師遊臺瀛，掛禪赤岩龍湖禪寺。晚年，遊巡此地，見山川奇麗，宛若仙境，遂結茅築舍，棲隱此間。康熙五十八年（1719），分奉赤岩龍湖禪寺觀音佛像，為開基佛奉祀於此，朝夕誦經勸化山民，附近鄉民信仰，遂集資修建，並奉祀三寶佛諸羅漢佛像，因名曰：大仙巖，又稱大仙寺。……後參徹禪師讓與弟子鶴齡主持，便於枕頭山另建一寺曰：碧雲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仲春，開山老和尚參徹大師歸西，葬於巖前。

從以上史料，可以知道陳永華創建龍湖巖，延請僧伽參徹來駐錫一事。又參徹在日後，興建了位於枕頭山即玉案山，也就是關子嶺的大仙寺及碧雲寺。不過他來臺的年代有《通史》的康熙十四年說及《通志稿》的康熙四十年說二種。如果參徹駐錫龍湖巖是陳永華邀請的說法無誤的話，康熙十四年說才是正確的，而四十年說，可能是誤載或是誤傳吧！因為陳永華逝世於康熙十九年的緣故，而且康熙十四年正是永曆二十九年，是鄭經應耿精忠邀約，移住泉州的翌年，參徹得以來臺是很自然的。再從陳永華請他主持來看，龍湖巖的興建應在康熙十四年以前才對。又《通志稿》卷 1，土地志勝蹟篇、龍湖岩寺條云：

龍湖巖古寺又稱赤山岩，位於台南縣六甲鄉七甲村赤山之麓，距林鳳營車站約里許。其建築廟寺傳說有二：一、謂明鄭時代參軍陳永華所建，時以陳參軍行軍至此，

p. 288

忽有雲霧迷濛，不能進兵，默禱觀音菩薩佑助，俄頃，雲消霧散，有感神麻，因建寺於此。.....

由此再參考《外志》所云：「親歷南北二路各社」是在永曆十九年時，更可佐證龍湖巖的興建，是開始於康熙十四年以前的說法。

從參徹來臺是在康熙十四年來看，《通史》及《通志稿》說參徹沒於乾隆五十五年二月的說法，可能是錯誤的，因為如此算來他在台有 115 年的歲月，這在一般說來，是太長壽的緣故。行筆至此，可以知道明鄭初期，竹溪寺、彌陀寺、龍湖巖相繼聳立於南台灣，且有僧侶自福建來台駐錫，從事於佛教教化的工作，故從文獻來作判斷，閩粵的佛教是在明永曆二十年，清康熙五年以前傳入台灣。而從推論來說，邢福泉說：

公元 1644（崇禎十七）年左右，大約有二萬五千戶中國人自大陸移徙台灣，大部份為忠於明室者。此等遷往台灣之移民中，必有誓不降清之忠貞知識份子，在中國佛教強烈影響之下，甚多移民極可能為佛教徒。根據早期移民者之慣例，當彼等遠離鄉土時，多數均將原供養在家或寺廟中之小型神像攜去台灣。吾人雖無法確知此種神像之名稱，但其中必有屬於佛教者。據研究，後期移民之宗教信仰發現，甚多來自福建與廣東之移民係佛教徒。故於荷蘭時期極可能已有佛教寺廟存在，且甚多移民崇信佛教。[39]

如果說宗教的傳播與貿易、移民有密切關聯的話，邢福泉的推論不是不能成立的。不過「在中國佛教強烈影響之下，甚多移民極可能為佛教徒」中的「在中國佛教強烈影響之下」的前提條件說法，似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因為佛教在中國的明朝，已逐漸衰頹，直到萬曆年間，因三大高僧：即紫柏達觀（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雲棲株宏（1535～1615）的出現，才有復興的跡象。而這三大高僧活躍的舞台是江南，所以說有受佛教影響的人，應以江南一帶人士為主才對。實際上在那個時代的士大夫信仰世界裏，依顧炎武在《日知錄》〈士大夫晚年之學〉中的敘述，是「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多好學儒」。所以筆者認為「在中國佛教.....」的說法，若改為「在江南佛教.....」的話，較符合事實。又筆者認為邢氏的推論可以成立的理由，是筆者想到明末因不願臣服於滿清，於承應三年（1654），從福州黃蘗山，以隱元隆崎禪師為首的移民集團，移至日本，同時將臨濟宗的一派黃蘗山的禪傳入日本，在日本京都宇治成立黃蘗宗的實例來看，[40]於荷西時期，

p. 289

佛教隨著江南移民的移居台灣而傳入，想必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從江南閩粵先民移居台灣的歷史來看，自三國時代，特別是宋室南遷已來，嘉義北港成為漢人與原住民貿易交流的場所，[41]加上江南、閩粵一帶自南北朝已來，佛教就盛行起來，尤其是彌陀淨土信仰在隋唐以後，隨其漢化而庶民化，普及於庶民階層。到了宋朝，結社念佛的風氣，流行於江南一帶，[42]逐漸與民間信仰融合來看，佛教在鄭氏據台以前，更早的話，是在南宋時期，就已隨著漢人的移居而傳入台灣的可能性，不能說是沒有。不過閩粵的移民，是在永曆十五年十二月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才逐漸形成潮流的緣故，[43]閩粵佛教隨著移民傳入台灣，是很自然的趨勢，也就難怪《文化志》要說：佛教傳入台灣，是在明末鄭氏的時代了。[44]

二、台灣佛教的源流

談到台灣佛教的源流，學者中多認為它是屬於中國南方的佛教系統，而且是禪宗的流派之一。在此，先列述學者們的看法於下：

- (一) 增田福太郎氏《台灣本島人 宗教》：
台灣寺院大致是南方的鼓山湧泉寺，或怡山長慶寺等的末徒所開拓，因此，皆屬禪宗。[45]
- (二) 伊能嘉矩氏《文化志》：
概屬南方佛教，禪宗的分派，臨濟、曹洞。[46]
- (三) 陳玲蓉氏《日據時期神道統制下的台灣宗教政策》：
台灣的佛教，多以中國南方的教派為主流，皆屬禪宗一派。....因台灣人之祖先多自閩粵二省移來，所以台灣寺廟多為福州巨刹鼓山湧泉寺或怡山長慶寺的僧人所開拓，加上台灣並無佛教的教育機關，僧侶修業有遠遊鼓山之風。[47]
- (四) 梁湘潤、

p. 290

黃宏介合編《台灣佛教史》：

永曆年間，來台的僧侶，由於交通近利，基本上是以福州湧泉寺（臨濟義玄——臨濟宗），.....故此台灣佛教在僧侶法脈之中，大抵都是以臨濟宗之祖派而列世，直至清同治以後，始逐漸失其祖系的世位。明永曆年間除了福州湧泉寺——臨濟宗的僧侶，對台灣寺院法脈影響深遠之外，另有一個法脈，即是福清黃蘗寺。[48]

以上陳玲蓉、梁湘潤及黃宏介諸氏均認為台灣佛教寺院概屬禪宗的一派，即臨濟宗。因福建的福州鼓山湧泉寺，是隸屬於臨濟宗的緣故。諸氏的看法，可能是根據日治時代日本學者所作的調查報告。關於日本學者的調查報告，除了上

列增田、伊能二氏之外，尚有丸井圭治郎於大正 3 年 3 月完稿的《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就說：「台灣佛寺，皆屬福州鼓山的末流。」[49]由此可知台灣佛教在日治時代及其以前，大都源自福州鼓山涌泉寺。不過梁湘潤、黃宏介二氏，認為台灣佛教源流除了臨濟宗的涌泉寺之外，另有一法脈，即福清的黃蘗寺。這說法，或許來自《通史》的「佛教之來，已數百年，其宗派多傳自福建、黃蘗之徒，實授衣鉢。」[50]吧！謝汝詮在林學周的《台灣宗教沿革志》作序說：「其宗派多傳自福建，衣鉢實授自黃蘗。」[51]《通志稿》亦說：

至於佛教之本流，是由福建鼓山及西禪兩大叢林傳來，另一派是由福清黃蘗寺傳來。[52]

然而，《通志》將明鄭時代及清代佛教歸納為臨濟宗、曹洞宗及黃蘗宗。[53]筆者認為如此的歸納有待商榷，因為無論在中國或台灣黃蘗宗均不存在的緣故。在教史上，位於中國福建省福州府福清縣（現在地名是福建省福清縣）的黃蘗山寺，或叫黃蘗寺，因山、寺經常是一體的緣故。此寺創建於唐代，是因唐中葉禪宗高僧黃蘗希運出家的寺院而有名。但五代以後就衰微，至明末，在名相葉向高護持下，因萬曆皇帝明神宗賜下大藏經為機緣，迎接復興的機運。又密雲圓悟、費隱通容、隱元隆崎相繼住山。

p. 291

而根據《黃蘗山寺志》，知道黃蘗山萬福禪寺的住持，自迎接嘉興海鹽（現浙江省海鹽縣）金粟山的密雲圓悟為住持之後，即與金粟山同樣是繼承臨濟宗的法脈。[54]由此可知道，黃蘗寺是歸屬於臨濟宗，在中國它並非是獨立的宗派。[55]

此福州黃蘗寺的僧侶，在明末清初因與唐王政權及魯監國政權的關係非常密切的緣故，及在明末南明政權衰亡前後大量移民到日本的情況來推測，福州黃蘗寺的僧侶到台灣來的，也應不是少數才對。[56]又此寺的僧侶，如隱元隆崎者，與鄭成功之間似乎亦有一段緣。江日昇的《台灣外記》康熙二十二年（永曆三十七年，1683）四月十六日條云：

成功踞金廈，震動濱海。有問黃蘗寺隱元禪師曰：「成功是何星宿投胎？」元曰：「東海長鯨也。」再問：「何時得滅？」元曰：「歸東即逝。」辛丑（永曆十五年）成功攻臺，紅毛望見一人峨冠博帶，騎鯨魚從鹿耳門遊漾而入。後功諸船果從是港進。癸卯年（永曆十七年，康熙二年）四月間，功未病時，有副將楊明夢成功冠帶騎鯨魚，由鯤身之東出於外海。覺而大異，與人述之。不數日，而成功卒。正符隱元「歸東即逝」之言。按隱元住黃蘗寺，德行精修。曾遣其首座報師過日本國。至港口，舟覆而死。越歲元往。將至港口，夢首座領眾來迎。次日，風浪大作，群魚千萬。船眾咸恐慄，共請於元。元

曰：「毋慮！」令侍者出紙筆書「免朝」二字於水仙門外焚之。頃而風息魚散，元居日本，國中人奉如活佛。

在此所說的隱元，是崇禎七年（1634）繼費隱通容之後，為黃蘗寺的方丈。於永曆六年（1652）接受日本德川家綱將軍的聘請到日本，後在日本開創黃蘗宗的人物。他圓寂於康熙十二年，赴日前活躍於福建福清一帶，可以說生存的時代與地域，與鄭成功都非常靠近。[\[57\]](#)雖然《外記》上的記載，帶有一點迷信的色彩，但兩者是同一時代，活躍的地域相同的緣故，縱使是不曾相遇，也會相知吧！何況黃蘗寺的僧侶，對政治的關懷有別於它寺，這從康熙六十年朱一貴作亂時，積極參與清軍殲滅活動來看（詳見後文），

p. 292

也可證明。又《通誌稿》所說的西禪就是增田氏說的怡山長慶寺。係唐咸通九年（868）瀋山懶安於怡山所創，後雪峰義存高足慧稜住此，才改為長慶院。[\[58\]](#)與鼓山涌泉寺同出自雪峰義存，而雪峰出自洞山良价，本屬青原行思法脈，與屬南嶽懷讓下的黃蘗希運、臨濟義玄是不同法系的，但都屬禪宗則是不諍的史實。又此一時代的禪宗，其信仰的內容，已經不是單純的禪宗而已。根據丸井氏的調查報告，其內容如下：

明末以後，包括清朝，支那佛教雖甚衰，但一言道出其信仰狀態的話，得謂禪與念佛的調和，是一混合式的佛教，而台灣佛教實亦屬此。試就台灣佛寺，問其所屬宗派如何時？眾口齊答禪宗。而在其較大者，構禪堂以奉釋迦觀音，其後堂或側房則安置阿彌陀佛。僧侶多時時修坐禪，但口常念佛，與他人相會時也互相拱手念阿彌陀佛。其經典，作為朝時課誦的有楞嚴神咒、大悲心陀羅尼、般若心經等；作為暮時課誦的有阿彌陀經，西方發願文等，此外尚有金剛經、楞嚴經、梁皇懺、水懺等，及誦一些陀羅尼。台灣僧侶或云心禪行淨，或亦云禪即淨，但我寧可說是朝禪暮淨較妥當吧！.....然而台灣佛寺，皆屬福州鼓山之末流，而鼓山涌泉寺，是以禪的系統，混合了淨土思想的緣故，台灣佛教，無不帶有天台或華嚴的臭味。[\[59\]](#)

除了丸井氏的調查報告以外，增田氏在《本島人 宗教》中亦說：

雖皆屬禪宗，但非如內地（指日本）禪宗的純度，是混有淨土的教義。即並祀觀音佛、阿彌陀佛等，念誦觀音經、楞嚴經、阿彌陀經。然台灣僧侶的無學，蓋不劣於支那，全島數千的僧侶中，能理解數卷經文者，是屈指可數。[\[60\]](#)

今日台灣學者如陳玲蓉氏在其著作《日據時期神道統制下的台灣宗教政策》頁75，也作了如上的譯述。從丸井氏、增田氏的調查報告，可以知道台灣佛教的

源流，可溯自江南，時代則不出明末。明末以來中國江南的佛教，在修行上是禪淨雙修，因此持誦《金剛經》、《阿彌陀經》、《觀音經》（可能是指〈普門品〉）

p. 293

是很自然的事。因為禪宗自六祖慧能以後，即以《金剛經》作為修行的準則，而淨土宗則在善導（613~681）時代，就以《阿彌陀經》為定課的緣故。至於《楞嚴經》，則是明末以來，就流行於佛教界，特別是在思想界。^[61]至於寺院早晚的課誦，自從明末以來，早課就以持誦〈楞嚴咒〉、〈十小咒〉；晚課則以念誦《阿彌陀經》、施放蒙山、懺悔文等為定課。^[62]

關於信仰，則以觀音大士為主，此事在台灣佛教信仰實況中，確是不諍的事實。如《文化志》卷中云：

大致在台灣佛寺的緣起中，傳說關於觀音佛祖靈驗的事情，顯著地發達，而且作為其祭祀的主體，好像看的最多的是觀音佛祖。^[63]

而形成此事實的原因，我想有二：(一)是與媽祖的信仰有關。(二)是與彌陀淨土的流行有密切的關係。在媽祖是觀音大世的化身，及隨著彌陀淨土信仰的普及，且在家家彌陀佛戶戶觀世音的信仰，尤其是在著重現世利益的信仰下，台灣佛教的信仰，以觀音大士為主是很自然的現象。不過，要申明的，是台灣佛教觀世音菩薩的信仰，已溶合了民間道教的信仰，也就是民俗信仰。^[64]

關於禪淨雙修的信仰型態，從教史的發展來看，它並不是台灣佛教才特有的型態，而是宋、元、明、清近世中國佛教信仰的主流。這已是學界共有的認識，台灣佛教的源流，傳自福建的緣故，也就難以脫離此種型態了。

三、滿清時期的佛寺及僧侶活動

p. 294

一、清朝成立的佛寺

1.開元寺

開元寺與竹溪寺、彌陀寺、法華寺齊名，是為台南四大古剎。根據王必昌《重修台灣縣志》卷 15，雜紀·古蹟云：

北園別館：在永康里，偽鄭氏為其母董氏建，後廢。康熙二十五年，巡道周昌因其地有茂林深竹，乃結亭築室；為之記，且繪而圖之。諸

羅令季麒光顏曰「致徹」。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宇、總鎮王化行改為海會寺。

而在該志卷 6，祠宇志·祠（附寺宇）中云：

海會寺（一名開元寺）在永康里（.....）。偽鄭氏建，為北園別館。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為寺。有田五十甲（坐寺後洲仔莊），園六甲零（坐寺後）。又樣園一所，供本寺香燈。乾隆十五年，巡道書成修。

又見於《重修台灣縣志》卷 6，祠宇志·寺宇，總鎮王化行〈始建海會寺記〉[65]中云：

.....附郭大橋頭有廢舍一所，宏敞幽寂，跨海面山，修竹茂林，朝煙暮靄。諸同人瞻仰於斯，僉曰：是三寶地，何不就此立寺，招僧伽以修勝果，亦盛世之無疆福田也。時兵巡王公，同聲許可。會有僧志中者，自齟齬之年，皈依沙門，秉靈慧沉靜之聰，函松風水月之味，從江右雲遊，來聞其事，願募緣成之。於是同人各捐俸資，補葺門楹，重整垣宇，粧塑佛像；始於庚午（康熙二十九年，1690）八月七日，成於明年（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八日，名曰海會寺。

又謝金鑾主纂《續修台灣縣志》卷 5 外編·遺蹟中北園別館條中的記載，與《重修台灣縣志》同，但是寺觀·海靖寺中云：

（舊名海會寺，亦名開元寺）在永康里。其初為鄭氏北園別館，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為寺。有碑記，置田五十甲，坐寺後洲仔莊；園六甲有奇，

p. 295

坐寺後；又樣園所，以供香燈。十五年，巡道書成修。乾隆四十二年，知府蔣元樞倡修，陳朝樑董其事。嘉慶元年，提督哈當阿修，改今名焉。

又該縣志卷 7 藝文(二)·記·台灣鎮哈當阿〈新修海靖寺碑記〉中云：

郡城北門外有寺，名開元，亦名海會，由來久矣。予奉恩命，兼鎮來台；嘗至其地，見夫頹垣毀瓦，神像幾失憑依，思有以新之，未果。今歲恭逢聖天子嗣大位，薄海內外，氣象聿新，梯航一家，咸各寧靖。予乃謀修斯寺，商之廉訪葦亭劉公，治堂楊太守，議允協。遂捐俸為倡，人皆競勸。惟擇十有二人董其役，閱五月而工竣，糜金六千三百有奇，而寺於是一新矣。.....因念臺為海疆重鎮，而南人尊

神，斯寺所以安神像也。今茲之修行，將仰荷神力，指引迷津，俾林無伏莽，海不揚波，愚頑者向化，跋扈者斂跡。至於年穀時熟，民皆安堵，重門不閉，宵柝無驚，庶靖之至乎；遂易其額曰海靖。凡所以修之之意蓋如此。

又陳文達纂《台灣縣志》卷9，雜記志·寺廟·在永康里：

海會寺，鄭氏舊宅也，距邑治四、五里許。康熙二十九年，台廈道王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為寺。佛像莊嚴，寺宇寬敞，亦名開元寺。

又《通史》卷22，宗教志·台灣廟宇表：

海會寺，在縣轄永康里，距大北門三里，為鄭氏之北園別墅。康熙二十九年，巡道王效宗，總兵王化行改建為寺，有碑記，尚存。置田五十甲，園六甲，樣圃一所，以供香火，延僧志中主之。花木幽邃，殿宇巍峨，為諸寺冠。乾隆十五年，巡道書成修，改名榴禪。嘉慶元年，提督哈當阿重修，又改名海靖，亦曰開元。其後疊修。寺祀釋迦佛，並供明延平郡王神位。

又《通志稿》卷2 人民志·宗教篇·佛教的記載，與《通史》同。還有《高纂府志》卷9 外志·寺觀，及《周纂府志》卷9 外志·寺觀云：

海會寺：康熙二十九年建，在府治北六里許。舊為鄭氏別館，蕩平之後，總鎮王化行，

p. 296

台廈道王效宗因其故址，建為寺宇，佛像最勝，住僧雲集焉，碑記載〈藝文志〉。

又同是府志的《劉（良壁）纂府志》卷18 古蹟·寺觀，《范纂府志》卷19 雜記·寺廟及《余纂府志》卷19 雜記·寺廟云：

海會寺：即鄭氏北園也，康熙二十九年台廈道王效宗、總鎮王化行改建為寺，佛像莊嚴，寺宇寬敞，亦名開元寺；（乾隆十五年台廈道書成修——《余纂府志》）。寺田在寺後洲仔莊五十甲，又寺前園六六甲零，又樣園一所，為本寺香燈（《范纂府志》及《余纂府志》作香火）。

綜合以上諸府志、縣志及《通史》，還有碑記中，有關開元寺的史料，可以歸納出如下的結論吧！

鄭克塽於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降清後，位於附郭大橋頭（即洲仔尾）的一處廢舍，因無人看管而日趨於荒蕪了。直到二十五年，巡道周昌，因其地有茂林深竹，就在此結亭築室並為之作「秋夜遊北園記」，[66]並繪圖之，諸羅縣令季麒光顏曰「致徹」。而此洲仔尾的廢舍，《高纂府志》、《周纂府志》均記為鄭氏別館；《劉纂府志》、《范纂府志》、《余纂府志》則記為鄭氏北園；《陳纂縣志》，則記為鄭氏舊宅；《重修台灣縣志》則為北園別館；《續修台灣縣志》為鄭氏北園別館；《通史》為北園別墅。根據第二任的巡臺御史黃叔璥《台海使槎錄》赤嵌筆談，泉井園石記所記，[67]鄭氏洲仔尾自臺江內海來看，位置在台灣府治即鄭氏承天府治的直北，所以稱做鄭氏北園，這就是北園的由來。又因北園是鄭氏的別館，而別館也是別墅，[68]所以有北園別館、北園別墅的記載。然而此鄭氏北園，是否如《重修台灣縣志》、《續修台灣縣志》所說，是鄭經為其母董氏所建的呢？關於這點，盧氏在〈北園別館與開元寺〉

p. 297

一文中，有詳細的研討，讀者可參考之。在此筆者借用盧氏文中所提的資料，來作答案。

林謙光《台灣紀略》沿革中云：

甲寅年（康熙十三年），經兵入漳、泉，委陳永華為諮議參軍，留守國政。丁巳（十六）年，兵潰，經守廈門；復令劉國軒攻開海澄縣。旋為大兵恢復，鄭兵潰去十有八九。遣劉國軒調殘兵，守澎湖；派殷戶出糧，抽壯民為兵，致民心離散，士卒喪氣。辛酉（二十）年，經預立其庶子鄭欽（係鄭克塽的乳名）為監國，退閒於洲仔尾，築遊觀之地；峻宇雕牆，茂林嘉卉，極島中之華麗；不理政務，嬉遊為樂。未幾，經卒。眾憚欽之嚴，迫之縊死。欽妻陳氏（即永華之女）亦登臺自縊。遂立鄭克塽為主，年幼政出多門。.....。

此中，關於鄭經退閒於洲仔尾，築遊觀之地一事；《台灣外志》卷 22，康熙十九年十月條亦云：

經以諸老宿如陳永華、柯平等相繼淪亡，不勝感嘆。遂於洲仔尾澤地，令李景監造園亭，種植花木。一日，景報竣。張日曜供設甚奢，請經遊。經同克塽、錫範、繩武、進功、國軒、洪磊、沈瑞、何祐、林陞、江勝、曾瑞、林應、陳諒、林順、鄭省英、邱輝、吳潛、楊德、黃良驥、鄭斌等文士武將，圍射酣樂，繼夜而散。經就洲仔尾園亭為居，移諸嬖倖於內，縱情花酒。下令長子克塽監國秉政，凡文武啟章一切事宜，悉聽克塽決斷。克塽既承委任，撫輯兵民，剛斷果決，有乃祖遺風。經之親信權倖莫不畏憚。經又慮克塽年輕，未得其宜，令人默取其所決諸啟章斷事者閱之，條條有緒，心大喜悅。以其後事

倚託有人，遂放縱於花酒，不預政事，而竟卜晝卜夜之歡。克卜即承父命委理政事，上至董國太、諸叔，下及鎮將兵民，繩以禮法，不肯阿容徇縱。

由上文可知鄭經的洲仔尾遊觀之處，就是《外志》所說的洲仔尾園亭，而此洲仔尾園亭，若如盧氏的考證，是鄭氏北園的話，[69]很顯然地，鄭氏北園並非如《重修台灣縣志》所說，是鄭經為其母董夫人所建的，而是自己縱情花酒，遊觀享樂的地方。此洲仔尾園亭，也被官方稱為承天府行臺，[70]因為鄭克塽降清以後，在志書上不方便以當時官式名稱記載，所以改稱鄭氏別館。

p. 298

康熙二十九年，台灣總鎮王化行有感於此地修竹茂林，朝煙暮靄，是建寺的適當場所，時得台灣第二任巡道王效宗的呼應，並得僧侶志中 [71]募緣成就之。時鎮署同人各捐俸資，補葺門楹，重整垣宇，裝塑佛像，始建於庚午康熙二十九年八月七日，落成於翌年四月八日，名曰海會寺。也因此，志中法師為開山第一代住持。又依據開元寺所保有的台灣第一早鑄的鐘的鐘銘，知道此鐘鑄於康熙三十四年孟春，重一千六百觔。此鐘乃志中師閉關募款而來，志中法師閉關三年，出關時作有一偈曰：獨坐釘關給善緣，募鐘立願利人天；一聲擊出無邊界，同種功德億萬年。志中師閉關時，由其高徒福宗，號竺庵，天資醇篤，能詩書，精武術，獲眾望，繼志中師衣鉢為開元寺第二代住持。此時開元寺已是一座具有相當規模、寺產的寺院，其寺產有田五十甲，園六甲零及棧園一所。這從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所刻的〈恩憲大人蔣捐買園業碑記〉中所云：

本寺原額園五十二甲，東至大橋頭坑墘，西至藩殿莊柴頭港坑墘，南至教場中樓仔莊大路墘，北至馬房山李家園，每年計收園稅銀一百零四員。[72]

可以窺知。盧嘉興認為上述的四至，正是府志或縣志上所說的寺後洲仔莊五十甲的範圍。他並指出：東至大橋頭坑墘，就是現在開元寺前即天仁兒童樂園後面；西至藩殿莊柴頭港，是現在台南市北區六甲里柴頭港；南至教場——中樓仔莊大路墘中的教場，則是九六新村、大道新村等一帶，而中樓仔莊，是現在台南市開元市場公路南邊一帶，所以中樓仔莊大路墘，就是現在開元路的北邊；北至馬房山李家園，是六甲頂縱貫公路南邊的高崙。[73]

由於寺宇寬敞，所以也名開元寺。又乾隆七年滿洲人的巡台御史書山，有題為「勸農歸路經海會寺與諸同人分賦」

p. 299

詩云：

雨後勸農畢，還尋古剎來；

鐘聲飄蘚徑，衲子出香台。

刺竹排簷種，優曇滿院開；

分題禪榻畔，小憩水雲隈。[\[74\]](#)

X X X

勸農親民事，歸途逸興同；

地高濃翠合，林靜妙香通。

喜得千村雨，閒來一畝宮；

寸心持半偈，頓覺海天空。[\[75\]](#)

時浙江錢塘人張湄御史，作有〈勸農歸路經海會寺次韻〉詩付之，其詩云：

山郭雨初霽，招提入來；

寒雲流梵韻，濕翠蓮臺。

鉢為投詩滿（僧石峰能詩），扉緣客開；

催耕餘好鳥，人靜林隈。

X X X

野趣自清曠，豐年情不同；

泉香茶椀碧，火宿石罏紅。

眺三層匹閣，栽花半畝宮；

舊時歌舞覓夕磬散煙空。[\[76\]](#)

上述張湄詩中有小注云：僧石峰能詩。此石峰，即釋澄聲也。《重修台灣縣志》卷 11，人物志·方技云：

釋澄聲，號石峰，海會寺住持也。戒行素著，擅書畫，好咏吟，尤善手談。有司聞其名，多就訪之。時或苦旱，延以祈雨，屢驗。

由於書山、張湄的詩，是做於乾隆七年的關係，澄聲石峰身為海會寺住持當是在這時期了。依今開元寺祖師堂所供奉牌位，此石峰即是第四代住持頂峰，在他之前的住持則是介山。之後則是道純、昭寬、道淵、榮芳。又從「乾隆十五年，巡道書成修」及台灣縣知縣魯鼎梅序云：

一葦東來，煙波萬狀。臺陽巋然，立海若中，恍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也。郡城東去二里許，有海會，清奧宏敞，歲久漸頹。前觀察書公葺其門庭，而殿廡未就，亭榭荒涼。乃者勸農之役，旌旄雲集，臨風弔往，矢懷若一，屬某以一言修之。夫渤海三山，相傳為人世所莫能至，故有銀闕金宮之稱。設果有之，亦幻境耳。茲寺之景象清華，加以整頓，不更有真致乎？吏情未覺滄州遠，感而遂興，是在同志者，因為序。[\[77\]](#)

上文中「前觀察書公葺其門庭」之書公，當指書成而言，但因書成是於乾隆十三年任台灣道，十四年即因憂去職，故可知書成修葺開元寺，是在十三年，而完工於十五年吧！依《通史》「乾隆十五年，巡道書成修，改名榴禪」的話，在乾隆十五年時，海會寺即開元寺，被易名為榴禪寺，但是乾隆十二年撰成的《范纂府志》卷 24、藝文五·詩二中有台灣生員盧九圍的海會寺詩，在海會寺詩題中註云：舊為榴環寺。因而可知榴禪寺就是榴環寺，而且其易名是在乾隆十二年以前，不是如通史上說的十五年，不過乾隆四十二年左右仍被稱為海會寺。又因年久失修，而由知府蔣元樞倡修，陳朝樑等負責辦理。這從現存於該寺內彌勒殿右室的〈重修海會寺碑記〉所載的，就可證實。其碑文內容如下：

天下事興廢之故，莫不有數焉存乎其間，詎必其在大者哉？雖數笏之宮，方丈之室，其適興適廢也亦然。此正如佛氏因緣之說，不必盡關福田善果也，則如余今日於海會寺重修是已。

當斯寺之未建也，窮奇禱杌之所窟宅、封豕長蛇之所蟠踞，雖其時亦復饒水木之清華，極雲煙之綿邈；而腥羶中之膏血塗之矣。未幾，通池既堙，重榭亦圯，墮虛甍之瓦，惟漬青苔；黯廢苑之叢，但飛黃蝶！此興廢之一時也。既而荒其哆館，忽植蓮幢；滅盡沉薰，聿新蘭若。是為斯寺創造所由來爾。其薙草開林，崇基表剎，實自前觀察偕總戎兩王公經始。嗣是置產皈筵，檀施不絕，

p. 301

海東象教，顯奕當時。迺以常住之業并於俗姓眾香之林，罕有護法，歷歲既久，高軌就荒。豈非王簡栖所云「僧□闕其無人，榱椽毀而莫構」？可為長太息者哉！此興廢之又一時也。

余也偶過斯寺，循廊拾級，目睹摧殘；飯僧無□，庇經無舍，婆娑洋外，一燈燿矣。於是揆日庀徒，工作具舉；層軒飛閣，精室珠林，丹牖者闈，金資寶相，以次營造，內外咸飾。更為釐其舊產，歸諸迦衛。庶幾蔭法雲於真際，曜慧日於康衢者歟？且夫儒者之疾言佛法也，為其無為出世也；然亦有不盡然者。夫處此毗舍耶中，炎海瘴鄉，眾生苦惱。是安得化猛鷲於慈仁，濯澳汙於清淨，拯沉淪以悲憫，覺迷罔以圓明者乎，則於彼法中，要不可少此締固也；何況興廢之故，因緣繫焉。試觀今日之琳宮紺宇、矢棘翬飛，皆昔之敗井頽垣、缺瓴斷甌也；今日之瓔珞莊嚴，髻鬢妙好，皆昔之篆綠蝸黃、愁雲慘霧也；今日之齋魚粥鼓，花盃香廚，皆昔之澤葵荒葛、冷煙寒雨也。悟成敗之迴環，感機緣之影幻，後之視今，當更何如耶？余以因寺之成，為之三歎而記之。護理福建分巡臺澎兵備道兼提督學政、臺灣府正堂，隨帶加六級紀錄八次紀功二十一次蔣元樞撰文。

乾隆四十二年四月穀旦，董事陳朝樑(下缺)。[\[78\]](#)

此中，「當斯寺之未建也，窮奇禱杙之所窟宅，封豕長蛇之所蟠踞」，是作者用來影射海會寺未建立前該址的情況，這也可從如下兩首詩來窺知。(一)是台灣第一任海防同知齊物體所咏「海會寺」云：

冷月橫斜弔子規，當年黃幄爾徒為；

梁塵尚逐梵音起，幡影猶疑舞袖垂。

風雨有時聞響屨，草花何用長胭脂；

是空是色渾間事，只合登臨不合悲。[\[79\]](#)

又另一是鎮標右營守備婁廣所咏「海會寺」（寺原鄭氏故宅）云：

此地當年擬館娃，蜃樓海市霸圖賒；

王孫已去遺芳草，宮院誰來掃落花。

p. 302

歌管聲沈聞貝葉，舞采徹現袈裟；

我非佞佛閒隨喜，喜見梯航願家。[\[80\]](#)

此中，子規、黃幄、梁塵、舞袖、響屨、胭脂、館娃、霸圖、王孫、宮院、歌管、舞衫等的詞句，是告訴我們，齊同知係以蜀王望帝、杜宇好色來比喻，而婁守備是以吳王夫差築館娃、宮藏西施來比擬。可見海會寺原是承天府行臺，同時也是鄭經亡國的離宮。[81]

在蔣元樞任知府時，海會寺的伽藍年久失修，寺院經濟也面臨窘境，因此蔣知府發動整修，而由楊朝樑責負其工程。同時整頓寺產，根據乾隆四十三年四月立的〈恩憲大人蔣捐買園業碑記〉所載，蔣知府捐買的寺產，有如下七筆：

- (一)、 蔡賽園一坵，在本寺南畔，東、西俱至車路，南至陳宅園，北至寺邊竹圍溝。……每年園稅銀二十四員。
- (二)、 吳福園一坵一甲四分，在寺後，東至車路，西至園岸，南至寧公車路，北至陳宅園。每年園稅銀十七員二錢。
- (三)、 吳勳園一坵七分，在寺後，東至水溝，西至車路，南至吳宅園，北至陳宅園。年年園稅銀十七員二錢。
- (四)、 陳盛園一坵，在寺後，東至車路，西至白家園岸，南至劉宅園岸，北至園岸。每年園稅銀十二員。
- (五)、 石禮園一坵一甲二分，在寺邊，東至車路，西至水溝，南至園岸，北至潘家墓埕。每年園稅銀十一員四錢。
- (六)、 州仔內石佛園一所，在本寺北畔，東南至馬房山，西北至柴頭溝坑墘。每年園稅銀十八員六錢。
- (七)、 寺後竹圍內園一所，東至本寺後，西至竹圍車路，南北俱至竹圍溝。每年園稅銀二十四員。

以上七處年共收園稅銀一百二十四員六錢。加上原有額園五十二甲而剩下園四十四甲四分半，所收園稅銀八十員七錢二分。還有鳳邑蘭波嶺腳淡水溪渡船一帶香燈銀五十兩及彰邑西門外荊桐腳莊朱映佃耕、朱火佃耕、朱全佃耕、蔡逢春佃耕等四處納該寺香燈粟六十四石四斗二升二合八勺。[82]

由以上史料來看，可以知道海會寺的寺產不算少，也可以說是很有規模的寺院。

p. 303

但是物象並非是永恆的，海會寺的伽藍歷經歲月之後，頹垣毀瓦是必然的，所以如前揭哈當阿〈新修海靖寺碑記〉所云：到了嘉慶元年（1796），才有以福建水師提督兼管台灣鎮總兵哈當阿為首向各界募款，[83]耗金約 6300 兩，費時五個月來修建，並以「至於年穀時熟，民皆安堵，重門不閉，宵柝無驚，庶靖之至」而易名為「海靖寺」。今開元寺內尚存有燕北哈當阿所題的「彈指優曇」匾額。

綜合以上的敘述而作整理的話，可知至日治時代為止，開元寺的沿革如下：金廈之役兵敗撤守台灣的鄭經於康熙十九年（1680）10 月，因耆宿陳永華、柯平

等相繼辭世，自己也無意於國政，遂立庶子鄭欽（鄭克□）為監國，自己退閒於洲仔尾築行臺（即承天府行臺），縱情於花酒，不預政事，竟其卜晝卜夜之歡。而此承天府行臺就是府志、縣志上所說的「鄭氏北園」、「鄭氏別館」、「鄭氏北園別館」。康熙二十九年，當時的台灣總鎮王化行與台灣第二任巡道王效宗等的倡議，僧侶志中師的募緣，在此北園別館建立了海會寺。從此歷經竺庵、介山、石峰等住持，寺院也因歲月的摧殘，而有乾隆十三年，巡道書成、台灣縣知縣魯鼎梅的相繼修建，並改名榴環寺或叫榴禪寺；及乾隆四十二年，由知府蔣元樞倡修，陳朝樑等負責督工的整建，並增置寺產；又到了嘉慶元年，有台灣鎮總兵哈當阿的修建，並易名為海靖寺，此寺名直至嘉慶十二年為止仍被使用，又依民國 46 年開元寺住持印明重修開元寺碑記，嘉慶二十年住持為奕是如公，是為臨濟宗第 38 世，且其身任台灣府僧綱司之職。又依盧氏「北園別館與開元寺」文，此寺在咸豐九年（1859），官府再募捐修建。同治年間（可能在同治三年，1864）榮芳禪師任住持，重修寺宇，宗風大振。依其牌位載其為：光緒壬午八年圓寂為臨濟正宗 48 代，且為中興開元寺的一代大師。

2. 法華寺

依照康熙五十九年（1720）《台灣縣志》卷 9，雜記志·寺廟·在東安坊法華寺條云：

偽時漳人李茂春構茅亭以居，名「夢蝶處」。後僧人鳩眾易以瓦，供準提佛於中，改名「法華寺」。康熙四十七年，鳳山知縣宋永清建前殿一座，以祀火神，匾曰「離德昭明」。殿後左右，建鐘鼓樓二座；前後曠地，徧蒔花果。又建茅亭於鼓樓之後，匾曰「息機」。自公退食之暇，時憩息焉。

由此可知，法華寺的所在，原是李茂春所居的夢蝶處。而李茂春此人，該縣志卷 8，

p. 304

人物志·寓賢中云：

李茂春字正青，漳州龍溪人；隆武舉人。遯跡來臺喜著述。仙風道骨，跣足岸幘，旁若無人。構茅亭於永康里以居，名曰「夢蝶處」。與住僧誦經自娛，人稱謂李菩薩云。

據此，似是李茂春將自己隱居處，取名為夢蝶處。但《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上冊，〈夢蝶園記〉中云：

嘉慶五年，裔孫李夢瓊、宗寅等，蒙府憲吳准將鳳邑主宋暨前府憲蔣原建陳永華所撰碑記，重給勒石。昔莊周為漆園史，夢而化為蝴蝶，栩栩然蝶也。人皆謂莊生善寐，余獨謂不然。夫心閒則意適，達生可

以觀化，故處山林而不寂，入朝市而不禁；醒何必不夢，夢何必不蝶哉？吾友正青善寐，而喜莊氏書。晚年能自解脫，擇地於州治之東，伐茅闢圃；臨流而坐，日與二三小童植蔬種竹，滋藥弄卉，卜處其中，而求名於余。夫正青曠者也，其胸懷瀟灑無物者也。無物則無不物，故雖郊邑煙火之所比鄰，遊客樵夫之所闐咽，而翛然自遠，竹籬茅舍，若在世外，閒花野草，時供枕席，則君真栩栩然蝶矣！不夢，夢也；夢，尤夢也。余慕其景而未能自脫，且羨君之先得，因名其室曰「夢蝶處」而為文記之。

由此碑文可知，此夢蝶園記原為明鄭諮議參軍陳永華所撰，但是因台灣隸屬滿清之後遭毀，其後雖有鳳山縣知縣宋永清於康熙四十七年、台灣府知府蔣允焄於乾隆二十九年前後鐫碑都被禁毀。直到嘉慶五年（1800）由其後裔李夢瓊、宗寅等的關係，得到台灣府知府吳逢聖的許可，將陳永華所撰碑記重給勒石。

陳永華所撰〈夢蝶園記〉，也被收錄於乾隆十九年纂《重修台灣縣志》卷 15 雜紀·古蹟·夢蝶園及嘉慶十二年《續修台灣縣志》卷 5 外編·遺蹟·夢蝶園條中。關於李夢瓊、宗寅的身份，據嘉慶五年〈李茂春瑩域勒禁侵佔告示碑〉所載，其身份如下：

特調福建臺灣府臺灣縣正堂、加三級、紀錄四次周為墾恩給示勒禁侵佔事。據生員李夢瓊、拔貢李宗寅、耆老李圭璋具呈詞稱：「緣瓊等祖李茂春、係漳州府龍溪縣人，登明末鄉薦。居臺永康里，築夢蝶園一處，讀書其中。法華寺地，

p. 305

即園故基。為人富著述，樂道義，時稱曰「李菩薩」。逝後，卜葬南城外新昌里。經蒙巡憲御史張六及海防憲孫賦詩題贈，建設神位，奉祀法華寺左。生平遺蹟，墳塋坐址，詳載〈臺灣府、縣誌〉中確據。但瓊等祖之葬於臺也，百有餘年矣；時序既遠，覬覦漸生。邇來多有豪強等輩，狡圖侵佔：或乘夤夜而盜葬、或拾瓦棺以偷埋，禍端波起，力阻靡寧。切思瓊等祖，名列賢書，蹟載紀傳，遺蹤疊蒙憲賞，抔土忍令橫傷？興其臨時角較，動費天心；曷若未雨綢繆，懇請嚴示！謹將誌內所載事蹟、詩序、碑記、抄粘呈電，恩准給示，以便勒石」等情。[\[84\]](#)

由此碑文可知，李茂春的后裔李夢瓊是生員，李宗寅是拔貢的身份。因為如此身份的緣故，獲得當時台灣縣知縣周作洵（嘉慶五年任）的同意出示此告示碑。又也可以知道夢蝶園就是法華寺的所在地。但是何時由夢蝶園易名為法華寺呢？據《周纂府志》卷 10，藝文志·記云：

火神廟記：……予宰斯土，見祭燿之義，闕焉不講；而居民廬舍時或遭回祿者，毋亦出納之違時，抑亦所以祀之者未有寧宇也？因與同寅李諸羅集諸衿，捐俸樂輸；有不足者，一一肩之。擇爽塏於府治東南僧舍，易其制而高大之；固以磚瓦，施以丹漆，命工肖像，而致時享。中堂祀大士，後院洎兩傍構列禪室；繞以竹木，間以花果，背山面流，巍煥幽深，亦招提一大觀也。因顏其寺曰「法華」，仍令僧徹空主之。……。

與上文同文的〈火神廟記〉，亦為《台灣縣志》卷 10 藝文志收錄，但遺漏了「因顏其寺曰法華，仍令僧徹空主之」一段文。加上如前文所引「法華寺偽時漳人李茂春構茅亭以居，名夢蝶處。後僧人鳩眾易以瓦，供準提佛於中，改名法華寺。」或許受此史料的影響，《周纂府志》卷 19 雜記·寺廟及《余纂府志》卷 19 雜記·寺廟中的法華寺條，均作如下記載：

即李茂春夢蝶處；後僧人鳩眾改建法華寺。康熙四十七年，鳳山知縣宋永清建前殿一座，祀火神；置鐘鼓二樓。前後曠地，徧蒔花果。起茅亭於鼓樓之後，顏曰「息機」；退食之暇，時憩息焉。乾隆二十九年，知府蔣允焄重建。殿宇巍峨，林木幽邃，備極勝概。寺田，在寺後荒埔一所約二甲餘，台灣府蔣毓英給為香燈；又有園在港西里大湖莊一所，

p. 306

鳳山知縣宋永清置為香火。

由上文可知，此二府志將《台灣縣志》中的「後僧人鳩眾易以瓦，供準提佛於中，改名法華寺」，省略為「後僧人鳩眾改建法華寺」。繼《台灣縣志》之後，乾隆十七年的《重修台灣縣志》卷 6 祠宇志·祠（附寺宇）法華寺條作：

在永康里，舊為夢蝶園；明舉人李茂春所築茅亭（別見「古蹟」）。康熙二十三年，改今寺。知府蔣毓英撥寺後曠地二甲有奇，充為香燈。四十七年，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增建前堂為火神廟，仍置香燈園一所（坐港西里大湖莊）。堂後設鐘鼓二樓，結茅亭於鼓樓後，匾曰「息機」。四圍徧蒔花果。

又嘉慶十二年的《續修台灣縣志》卷 5 外編·寺觀·法華寺條則云：

在永康里，舊為夢蝶園，康熙二十二年改為寺。知府蔣毓英以寺後曠地二甲零為香燈費。四十七年，鳳山縣知縣宋永清增建前堂，為火神廟，置香燈園一所，坐港西里大湖莊。堂後設鐘鼓二樓，結茅亭於鼓樓後，曰息機亭，周蒔花木。

由上二文可知，該二縣志記夢蝶園改為法華寺的年代是：一為康熙二十三年，另一是作二十二年。不過，《高纂府志》與《周纂府志》卷9外志·寺觀附宮廟·夢蝶園條中云：

在府治社稷壇南數百武，先是漳人李茂春寓此，築茅齋以寄放浪之情，扁曰夢蝶，後易以陶瓦，清流修竹，日增勝槩，改為準提庵。

由於上文是出自台灣最早的府志，又參閱重修、續修縣志的話，可以知道在蔣毓英知府的時代，也就是康熙二十三年，[85]住在夢蝶園的僧侶們，將茅草屋改以陶瓦重建，並易名為準提庵，因內奉準提佛的緣故。當時蔣知府以寺後荒埔一所約二甲餘作為該庵的香燈錢。由此可以證明王纂、謝纂二縣志說康熙二十三年改建為法華寺之說，是受到余纂、周纂府志的影響所致，因此後人也就以訛傳訛了。又曾源昌（明經出身）的「法華寺（即夢蝶園）詩云：

p. 307

路轉幽篁裏，逶迤匝淺苔；

薊桐將合抱，香樣未成胎。

樓聳懸鐘鼓，庭荒闢草萊；

燒檀飄戶外，啼鳥傍林隈。

離德昭金殿（前殿祀火神，匾曰「離德昭明」），禪心悟劫灰；

雖多收敗葉，漸欲變枯荄。

觀射亭猶在，息機人未回（宋澄菴明府結茅亭校射扁曰息機蓋射畢停驂處也）；

無心溪水去，有意野雲來。

殘藥風輕剪，寒爐火欲煤；

村煙空處渡，野色望中開。

誰展揮毫手（鼓山遊僧摹「藏空」兩字，絕佳），同傾瀾茗杯；

猶遲辭文室，相顧兩無猜。[86]

及《台灣縣志》卷 9 雜記志·東安坊法華寺條，暨宋永清的〈火神廟記〉等的史料，可以知道夢蝶園易為「法華寺」，是在康熙四十七年鳳山知縣宋永清在此建火神廟的時候，而且宋永清還禮請僧侶徹空法師為住持，自己也常在此後殿所築的茅亭名為息機的地方渡假休閒。而且為維持寺院生計，為其置有香燈園一所。

又乾隆八年身任福建分巡台灣道、按察使司副使的劉良璧，撰有〈重修法華寺碑記〉，其內容如下：

天下有竭蹶以殫乃職，積累而成厥功，此非立品高而矢志篤者，不能與也。乃如之人，雖緇流也，亦足傳云。臺之永康里，有寺曰「法華」，即志所稱隱士李菩薩之「夢蝶園」也。後人因其處募建為寺，郡守蔣公毓英、鳳令宋公永清，先後成之。置香火資，足供住持用。地幽靜，竹木森環，亦海外一名剎也。康熙六十年地震，佛堂坍塌，廊廡傾頽。其僧曰伯夫者，慮其為墟也，與同儕心覺、心慧，節口縮腹，積十數年羨餘，漸次修葺。既竣前後二堂，新塑神像，復拓其舊址，重構兩廊為休憩所。計費四百餘金，一瓦一木，不募諸施，皆僧人粒積而就。此其品其志，洵卓然矣。

夫僧為寺守，僧而修寺，僧之職也。然往往藉以殖貨者，募百費十，苟且賽責；幾見有如伯夫積十數年之儉壹，

p. 308

而梵宇煥然一新乎？夫人惟自奉不能儉約，所以不能無取於人；惟不能堅其志以有為，所以事不克有濟。誠竭蹶而積累焉，又何職之弗殫、而功之弗成哉？如僧伯夫者，可以風矣！寺僧以記請，因執筆而為之傳，且取為世訓焉。

隱士李茂春，字青正，漳之龍溪人，明鄉進士。航海結茅居此，與僧日往來，人稱李菩薩。卒葬新昌里，舊無記，因併及之，以著其權輿，而隱士亦以不泯云。

乾隆八年歲次癸亥仲夏穀旦，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福建分巡台灣道、按察使司副使、加二級劉良璧撰。[\[87\]](#)

由上碑文，可以知道，繼徹空師之後，住持法華寺者是伯夫師。而且康熙六十年的地震，使得法華寺的伽藍倒塌，伯夫師與心覺師、心慧師等以十餘年，省吃儉用累積下來的錢銀，重建法華寺。其規模除有前後二堂外，還多了兩廊，俾供信眾們休憩之所。此段史實在各府志、縣志均缺載，這是有遺憾之處。

歲月移至乾隆三十年，台灣知府蔣允焄時代有〈重建火神廟碑記〉，其內容如下：

城南法華寺，舊夢蝶園址，郡名勝也。康熙四十七年，鳳邑令宋公永清改前殿，祀熒星火神。余惟南方之傾，地勢之下，巽巳之間，火星所屬，見諸郭璞「爾雅」注。臺宅嵒夷，下窮南紀，位界離明，次躔鶉尾，蓋祀典不可缺者，而堂廡隘陋弗稱。余自癸未（乾隆二十八年）量移茲郡，鬱攸為災，循例展謁，討論舊典。思夫古者司燿祭燿，季春出火，季秋納火；火政之修，與土穀之神並重。春秋時四國災，鄭子產為民請命，使郊人除於國北，禳火於元冥、回祿。蓋古者事神，即所以治民，幽明貫通一理；固不獨燧人氏修火之列，范金合土功在後世，為所宜報已也。爰集匠氏，廓而新之。經始於甲申（乾隆二十九年）四月，越明年乙酉二月工竣計費番鎊若干兩。法象莊嚴，簷牙高敞；即內殿浮屠焚修所，為郡名勝，亦恢前緒，繚以垣牆，加以丹艦，俾改觀焉。繼自今崇祀有所，報享有時，妥靈揭虔，致其肸鬻；於以導迎善氣，孚佑下民，氣著昭明，民無坻伏，斯足答靈貺於無窮也已。是役也，參其議者臺邑陶尹、贊其成者司馬徐公，均有勞焉，既隴石，例得並書。[88]

p. 309

根據此碑記的內容，知道蔣允焄知府是在乾隆二十八年到任，後見法華寺前殿火神廟堂廡隘陋，而於二十九年四月著手擴建之，至翌年二月完工。又蔣允焄〈新濬永康里南湖碑記〉云：

.....城南法華寺前十數武，有地沮洳，廣可數畝；左受蓬溪，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逕新昌里蜿蜒入海。諸山環抱，林木參差，此天然邱壑也。且以水利言，近治田，乏水源；壤地平行，雨淋則溢，旱則涸。郡人疏泉引水，濬為畎澮，曰陂、曰圳，費常不貲。今因勢利導，瀦而為澤。旱則引有源之水，以供車戽，足以不竭；澇則導右支流，決而洩之，以妄輸於海，亦不至溢，尤為利所當興者。特土脈惡，沙流轉徙。挖之不深，則水圩沙壅，淹為平源；挖之過深，則土岸單薄，易就坍塌，皆非所以計久遠耳。予暨僚屬議之，未得竅要。時臺尉虞君好善，曾於山左任河渠工，諳蓄洩事；進而言曰：茲事非所宜慮。凡近水土岸，易潰決者，宜杙木樁，俾地基固，後迺培之。且臺地有蒜茶樹，蟠根最密；今環渠植之，並砌水門，以時啟閉，可無憂崩潰矣。予領之，稔其足以任事也，專以任之。虞尉陟降郊原間，赤日炎蒸，躬巡鑿鼓，不辭勞瘁。自乙酉（乾隆三十年）季春（陰曆三月）訖仲夏（陰曆五月）合三閱月竣事。北岸邇寺前，南岸

砌舞榭，東西岸有眺臺、八卦亭、福德祠諸勝。並為輿梁，一以通往來陟門，二以備蓄洩。每歲時麗景，老幼熙皞，予率僚案浮小艇，觴詠其中，山光水色，恍然注目，與民樂之，忘其身在海外也。……抑是役也，荒度土功，虞尉之力為多；而康高、陳珪，悉心董事。既礮石，因並紀之。[89]

由此碑記，可知蔣允焄知府就法華寺前數畝沼澤地，闢一南湖的經過情形，及當時南湖的景色、建築物：北岸接近法華寺，南岸有舞台，東西岸有眺台、八卦亭及福德祠。此南湖也就是連橫說的半月池，[90]位在今日府連路與健康路一帶。又據〈新建南湖書院碑記〉云：

……既抵任後二年，得南湖數畝，諸山迴抱，林木參差，有巖足陟，有川足泳，

p. 310

有緇廬寶剎足遊憩，有崇臺阿閣足登覽，有佳木繁花足挹翫。柳子厚有云：「惟天鍾秀，不退於遐裔，斯足當之矣。……」曩以崇文齋舍湫隘，士之肄業其中者，無以展拓性靈，而日就固陋。今得名勝之區，於氣運日新之年，藏修游息，其成就又復何如耶？爰捐廉俸，廓而新之，而吳誠、許居、王賞實踴躍趨事。傍湖構學舍數座，別建講堂於法華寺左畔，隨方位置，不綴續也。

由上文，知道蔣允焄於乾隆三十年在此南湖，創設了南湖書院。此書院與海東書院，[91]都是蔣允焄知府致力文教事業的具體成果。遺憾的，是此書院到了嘉慶年間因「院長居此者多欠康」而廢。[92]依乾隆三十一年「蔣允焄去思殘碑」，[93]公號為光，黔省貴陽人，二十八年任台灣知府。又依《續修台灣縣志》卷 2，政志·憲紀，蔣允焄是乾隆二年進士，於二十九年十二月護任，三十四年二月任台灣巡道，致力於整修各廟宇、營建宮廳，尤其是上述二書院，更是巍煥壯觀，多士得絃誦其間。致於蔣允焄整修的廟宇除法華寺外，尚有風神廟、龍神廟、藥王廟、水仙宮、小媽祖宮、武廟宮廳、超峰寺、嶽帝廟鐘鼓樓、萬壽宮等。[94]

蔣允焄於法華寺前，闢建南湖，本為旱潦時，能發揮蓄洩的功能，[95]但是同治二年台澎道洪毓琛示禁的〈法華寺放生池示禁碑記〉云：

欽命按察使銜台澎兵備道加提督學政洪示：寺前池內，鱗介放生。嚴禁住持、附近軍民，不許捕捉，永遠遵行，如敢故違，立拿重懲。[96]

p. 311

由洪毓琛示禁的碑記，顯然地告訴我們在同治年間南湖已成為放生池，昔日蔣允焄於端午節與民眾一同觀覽遊樂之所，其在南湖所建的半月樓已傾圮，池水也漸淤，失去旱澇蓄洩的功能。[97]連橫有感於此情景而咏云：

山色蒼濛斷翠霞，一池秋水落荷花；

風流太守今何在，半月樓空噪暮雅。[98]

佛教云：諸行無常。世上事物本是循此原則而轉移，乾隆年間蔣允焄開濬的南湖，於同治年間已成為放生池，如今成為田園，附近更是民房密建，南湖及半月樓的蹤跡已是蕩然無存。[99]又連橫於《雅堂文集》卷3 台南古蹟志·夢蝶園云：

光緒初，巡道夏獻綸修之，手書「夢蝶遺蹤」。乙未（光緒二十一，1895）後，日就傾圮。近數年間，南人士集資重建，中置一龕，祀李孝廉。

及《雅言》第147條云：

夢蝶園在台南小南門外，……少時余遊其地，有「夢蝶遺蹤」之匾，為台灣兵備道新建夏獻綸所書；今亡，而園亦日廢矣，追思勝流，寧不感歎！

由以上連橫所見聞的史料看來，到了光緒年間(1875~)法華寺因年久失修，所以台灣道夏獻綸加以整修，並書有「夢蝶遺蹤」匾額，可惜到了光緒二十一年（1895）此匾額已不知流落何方，且法華寺的建築物也到了必須整修的時候。又到了民國6年，月眉山靈泉寺開山善慧師受聘南來駐錫，擔起募緣重修法華寺的重任。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以清楚地明白法華寺原是明末隨鄭成功來台的李茂春隱居之處，

p. 312

當時的諮議參軍陳永華為之取名曰夢蝶園，該處也住有僧侶。歲月移至康熙二十三年第一任台灣知府蔣毓英的時代，該處僧侶以陶瓦易茅草，整修夢蝶園，並塑準提觀音供養，遂易名為準提庵。到了四十七年，鳳山知縣宋永清將準提庵加以整修，易名為法華寺，於中堂供奉觀音大士，並於兩旁增建僧房。又於中堂前建前殿以祀火神，此殿後左右方則有鐘鼓二樓，在此鐘鼓樓之後，則有一茅亭為「息機」，是宋知縣公務之暇養心之處。六十年因地震，法華寺中堂坍塌，廊廡傾頹，其時住僧伯夫師、心覺師、心慧師等加以修葺，費時十餘年，於乾隆八年，終將前後二堂修竣，並新塑佛像，擴大其規模，將兩廊作為休憩所。二十九年，蔣允焄知府重修火神廟；三十年利用其原有的地形之便，

開濬一南湖，也叫半月池；且在此湖中，立一半月樓；東西岸有眺臺、八卦亭、福德祠，且有橋樑連之，使此湖能通往來，達蓄洩功能，並為名勝之區。逢歲時節慶，與部屬、民眾、浮小艇，觴詠其中，寄情於山光水色之中，達一時忘我之境。並為疏解崇文書院齋舍的狹隘，以展拓士子的性靈，於此湖傍構學舍數座，別建講堂於法華寺左畔，此南湖書院之規模。但此書院因建物結構不良，士子身體常出狀況，故於嘉慶年間廢止。而此南湖也因泥沙淤積，於同治年間終成放生池、水田。如此物換星移，滄海桑田，驗證佛言：諸行無常之餘，也說明了該處人口、環境變化的情況。到了民國 6 年，月眉山派的善慧、善性、善昌三師相繼住錫，故法華寺成為月眉派的寺宇。此三師且為遊學鼓山涌泉寺的僧侶，均承傳臨濟正宗。

Early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aiwan

Ven. Hui-Yen

Associate Researcher, Chung-hwa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

Summary

Those who were born and grew up in Taiwan should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the land. This is already the consensus of most people living in Taiwan. From thi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s a Taiwanese Buddhist she has th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aiwan. Based on this recognition, the author tries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in Taiwan."

First, the author chooses the Buddhism in Ming and Ch'ing Dynasties as the field of research. This is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Buddhism in Taiwan from longitudinal side, i.e. the process of time. The other field of research is the Buddhism in the area south to Yantze River and Fuchien. This is a look on the Buddhism in Taiwan on the horizontal side, i.e. the area. In this way one may understand the Buddhism in Taiwan which has a history of 400 years. This paper first intruduces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period of history by scholars. Secondly, it discusses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aiwan and its origin. As regards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aiwan, the justification is based on the time of the building of Chu-hsi-szu Monastery and Mi-to'u-szu Monastery, two of the four large and old monasteries in Taiwan, as well as the story of monk Cha'n Tz'e who came from Fuchien to Taiwan to take charge of the T'chi-shan Lung-hu-yen Monastery and to construct the Bi-yun-szu Monastery and the Ta-shien-szu Monastery.

As regards its origin, the material is based on the writings of the Japanese and the religio census report by the Gener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thus resulting in the sectarian belongingness and the content of faith of the Ku-shan Yuon-Chuan-szu Monastery and the Huang-po-shan Wan-fu-szu Monastery. Next,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history and the monk's activities of Kai-yuan-szu Monastery, Fa-hua-szu Monastery and Huang-po-szu

p. 314

Monastery in Ch'ing Dynasty. All these three monasteries were built in Ch'ing Dynasty. However, due to the limit of space, the Huang-po-szu Monastery and the monk's activities are left to be discussed in next paper.

[1] 《台灣省通志稿》卷2 人民志·宗教篇，頁68~71，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民國45年。

[2] 《台灣省通志》卷2 人民志·宗教篇，頁10右~15右，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民國60年。

[3] 〈台灣支佛教〉（《げどげ佛教史IV中國編東 げどげ諸地域支佛教》頁129~186），佼成出版社，昭和52年2月1日）。

[4] 《台灣佛教史》頁13~269，行卯出版社，民國82年5月。

[5] 《台灣的佛教與佛寺》頁3~6，台灣商務印書館初版第三刷，民國81年7月。

[6] 《通志稿》，頁67。

[7] 盧嘉興〈台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古今談》第9期頁33，1965年），1979年收於《中國佛教史論集台灣佛教篇》（《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7》，大乘文化出版社）。

[8] 依據盧嘉興於右文的報告：此志書是清領台灣最早的志書，康熙三十三年（1694）編纂，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行。是由第三任的台廈道高拱乾，責成志草開志局纂成。目前流通於台灣的《高纂府志》，是民國44年台灣大學教授方豪氏，託由日本友人向日本內閣文庫洽商攝影，獨資重印而來（右書頁32）。

[9] 康熙五十一年（1712），第五任台灣府知府周元文所纂修，刊行於57年以後。

[10] 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七任海防同知兼攝台灣縣事王禮主修，歲貢生陳文達、林中桂、生員李欽文等編纂。是台灣舊縣志最早的刊本，現在的流通本，是民國46年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採訪組長陳漢光氏向美國國會圖書館攝影取得，並由文獻會影印重刊於世（依盧嘉興右文）。

[11] 康熙五十三年（1714）知事周鍾瑄主修。

[12] 王必昌主修，乾隆十七年（1752）刊行。

[12] 台灣府巡視台灣兼提督學政監察御史范咸主修，刊行於乾隆十二年（1747）。

又有台灣府知府余文儀主修，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行的《續修台灣府志》，簡稱《余纂府志》。此中，有關明鄭三寺的記載，與右書同。

[14] 民國 2 年連雅堂著，筆者所用版本，乃民國 74 年 1 月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修訂校正版。

[15] 伊能嘉矩（1867～1925）著，東京，刀江書院，1928。

[16] 台灣總督府，1916 年。

[17] 松本曉美、謝森集合編，創意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版。

[18] 收錄於《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87》，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68 年元月。原刊於《古今談》第 29 期《台灣研究彙集》了。

[19] 原刊於《古今談》第 78 期，重刊於《台灣研究彙集》12，民國 61 年 8 月 30 日。

[20] 依據嘉慶十年（1805）〈重建彌陀寺碑記〉中云：「考昔檀樾洪公，佈施捐造；歷今百有餘年……。」（《台灣南部碑文集成》頁 182，收錄於《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九輯》，台灣大通書局，民國 66 年 6 月。）

[21] 見《高纂府志》卷 9 外志，《周纂府志》卷 9 外志。

[22] 彌陀室書院，為台令王兆陞（台灣縣第三任的知縣，江南通州人，丁酉舉人，康熙二十七年任，三十年陞兵部職方司主事）建；肖像祀焉。在台灣縣永康里，康熙三十一年建（《高纂府志》卷 2，規制志書院）。

[23] 嘉慶十年〈重建彌陀寺碑記〉（《台灣南部碑文集成》——《台灣文獻史料叢書》）。

[24] 嘉慶乙未（四年）而紳董黃拔萃等復為重建擴大規模，至是又經百三十八年之久，迨明治兵燹後，又歷大正乙亥（應為壬子）為新豐郡衙，越十二年時還壁。……黃氏茂筮、谿荃伯仲及住持僧王兆麟等目擊心傷，乃出為提倡共襄是舉。……乃于大正十五年臘起工，昭和三年竣功。……夫廟宇三十年一大修，十年一小修，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昭和四年秋日胡殿鵬南溟拜撰。

[25] 圓斌師原籍高雄鳳山市，……依大仙寺開參老和尚出家。夙秉慧根，精持淨業，民國 55 年經彌陀寺諸大護法敦請下山為現任住持……及民國 60 年春，因緣成熟，彌陀寺奠基重建，歷十星霜，於焉古剎重現莊嚴（〈彌陀寺重修碑記〉）。

[26] 《范纂府志》卷 22，藝文（三）·詩。

[27] 沈光文〈東吟社序〉云：余自壬寅（可能是壬辰之誤，即永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將應李部臺之召，船至圍頭洋遇颶，飄流至斯（《余纂府志》卷 22，藝文）。

[28] 「……成功因改台灣為偽東都，設一府二縣，偽立府尹及天興、萬年二縣。壬寅（十六年）五月，成功卒。提督馬信立其胞弟世襲，改號護理。癸卯（十七）年，成功之子鄭經自廈門來，與世襲爭國。世襲兵屈退歸，經遂嗣立。後經至廈，委翁天祐為轉運使，任國政。於是興市肆、築廟宇、新街、橫街，皆其首建也。癸卯年，廈門敗，經由銅山入灣；改東都為東寧省，前後招納內地兵民眷口以實之。甲寅（二十八）年，經兵入漳、泉，委陳永華為諮議參軍，留守國政。……」（林謙光《台灣紀略》沿革）

沈光文〈平台灣序〉云：壬寅年，成功物故，鄭錦僭王；附會者言多諂媚，逢迎者事盡更張。（《余纂府志》卷 22，藝文三）

[29] 《范纂府志》卷 22，藝文（三）·詩。

[30] 以上沈光文傳，參考《明史》卷 276 沈宸荃傳、《台灣通史》卷 29 諸老列傳、鄧傳安《蠡測彙鈔》〈沈太僕傳〉（見《鮎琦亭集》卷 27），及盧嘉興〈台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

[31] 參考盧嘉興氏〈台灣的第一座寺院竹溪寺〉。

[32] 時臺為荷人所踞，受一廬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也。……十五年延平郡王克台灣，知光文在，大喜，以客禮見。……王令麾下致餼，且以田宅贍之。（《通史》卷 29，諸老列傳·沈光文）。

[33] 見注 28。

[34] 江日昇《台灣外志》卷 13：（永曆十八年）七月，鄭經分配諸鎮荒地，寓兵于農，又在承天府起蓋房屋，安插諸宗室暨鄉紳等。八月改東都為東寧，天興、萬年二縣為州。（頁 224），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4 月。

[35] 據盧氏上揭文的研究：竹溪於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清濬南湖所記的碑記，稱做蓬溪。到了道光年間，叫做溪仔墘溪。依照《台灣采訪冊》，水勢記云：「溪仔墘溪，源出東門外太爺廊前，南流大橋頭，過竹溪寺邊，轉過曾、蔡二姬崙，旋轉經溪仔墘，西流鹽場，注台江。」又因這條溪流流經鹽埕村落，所以俗稱做鹽埕溪，現稱做日新溪。

[36] 見《台灣縣志》及《重修台灣縣志》，又請參考盧嘉興前揭文。

[37] 《古今談》第 9 期，頁 36，1965 年。

[38] 以上陳永華傳，係參考《台灣外志》及《偽鄭逸事》陳參軍永華（《余纂府志》卷 19，災祥）。

[39] 邢福泉前揭書，頁 3~4。

[40] 林田芳雄氏〈明末清初閩僧東渡考〉（《史窗》第 47 號，京都女子大學史學會，1990 年 3 月）。

[41] 參考張曼濤〈台灣支佛教〉（《げどげ佛教史中國編IV——東げどげ諸地域支佛教》）頁 129。

[42] 參考拙文〈從彌陀淨土信仰的漢化到淨土宗的成立〉、〈淨土思想庶民化的影響〉。

[43] 《通志稿》卷 2，人民志宗教篇，頁 68。

[44] 《文化志》卷中，頁 460。

[45] 頁 21，財團法人明治聖德記念學會，昭和 12 年 3 月 31 日。

[46] 卷中，頁 460。

[47] 頁 75，台灣本土系列二、31，自立晚報文化出版部，民國 81 年 4 月。

[48] 頁 25。

[49] 頁 21，台灣總督府。

[50] 頁 551。

[51] 民國 39 年 12 月 8 日完稿。

[52] 頁 67。

[53] 頁 6，右。

[54] 以上參考林田芳雄氏〈福州黃蘗山寺志諸本の比較検討〉（《史窗》第 46 號，頁 39 上～45 下，京都女子大學史學會，1989 年 3 月）。

[55] 此乃對日本黃蘗宗而言，它位於京都府宇治市。

[56] 參考林田氏前揭文。

[57] 以上參考李添春〈明末清初的台灣佛教〉（《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68，大乘文化出版社，民國 68 年元月）。

[58] 《雪峰真覺大師年譜》（《卍續藏》119 冊，頁 974 上～981 下）、《宋高僧傳》卷 13〈後唐福州長慶院慧稜傳〉（《大正藏》卷 50，頁 787 上）。

[59] 《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頁 20～21。

[60] 頁 21。

[61] 荒木見悟氏《佛教と陽明學》頁 150~164，第三文明社，1979 年 8 月 31 日。

[62] 詳見雲棲株宏《諸經日誦》（《蓮池大師全集》二），東初出版社。

[63] 頁 463~464。

[64] 劉枝萬氏〈清代臺灣之佛教寺廟〉（《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188）。又將自南北朝時代就流行的觀世音信仰，與彌陀淨土信仰一體化，是十二世紀末葉的事。在王日休（1105~1173）的《大阿彌陀經》中，已有具體的表現，筆者將此信仰的型態，稱之為現世利益淨土觀（詳見拙著〈無量壽經糝合本の一研究——王日休大阿彌陀經——〉，《佛教史學研究》第 30 卷第 2 號，頁 119~120，日本佛教史學會，昭和 62 年 10 月 3 日）。

[65] 總鎮王化行〈始建海會寺記〉亦被收錄於《續修台灣縣志》卷 7 藝文(二)記。

[66] 鄭氏北園，去郡治五、六里；從海視之，則直北矣，故名。園在平壤，無邱壑亭台，曲折峻峻之致。丙寅（康熙二十五年），台廈道周昌因其地，仍其茂林深竹結亭築室，為之記，且繪而圖之。季麒光顏曰「致徹」，有「秋夜遊北園記」，昌於道署後築小園，名「寓望」蓋取左史量有寓望之言；麒光亦有記（黃叔璥《台海使槎錄》卷 3 赤嵌筆談·泉井圍石有記）。

[67] 同上注。

[68] 以上參考盧嘉興氏〈北園別館與開元寺〉（《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277）。

[69] 《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277~280。

[70] 見阮旻錫《海上見聞錄》辛酉康熙二十年海上稱永曆三十五年正月廿八日條、夏琳《海紀輯要》卷 3 辛酉明朔永曆三十五年春正月壬午條、《閩海紀略》辛酉永曆三十五年正月廿八日條。

[71] 志中僧，號能禪，別號行和，福建泉州人。秉性慧敏自幼出家，住承天寺數年，明教通宗，喜雲遊四海，從江右來臺（參考盧氏前揭文——《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282）。

[72]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下冊，頁 531。

此碑存台南市北區開元寺彌勒殿前右壁，高 201 公分，寬 64 公分，花崗岩，缺題。碑中所稱「恩憲大人蔣」，係指知府蔣元樞（前揭書，頁 532）。

[73] 盧氏前揭文，《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279。

[74] 《重修台灣縣志》卷 14，藝文(二)。

[75] 《余纂府志》卷 24，藝文五·詩二。但連橫《台灣詩乘》作「省藉親民事.....」。

[76] 參考盧氏前揭文（《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285~286）。

[77] 《重修台灣縣志》卷 6，祠宇志·寺宇。

[78]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上冊，頁 105~106。

[79] 《周纂府志》卷 10，藝文志·詩。

[80] 同上注。

[81] 參盧氏前揭文。

[82]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下冊，頁 530 ~ 532。

[83] 嘉慶元年〈新修海靖寺殘碑〉（《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下冊，頁 545~547）。

[84]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下冊，頁 436~437。

[85] 蔣毓英任職台灣知府是在康熙二十三年的緣故。

[86] 《台灣縣志》卷 10，藝文志·詩。

[87]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上，頁 33~34。

[88] 《續修台灣縣志》卷 22，藝文三·記。

[89] 同上注。

[90] 半月池在小南門外，廣可十畝，即南湖也，左受蓬溪，以接內山之流，右出大南門，經新昌里，蜿蜒入海；知府蔣允焄濬之，為旱潦蓄洩之資（《雅堂文集》卷 3，台南古蹟志·半月樓）。

[91] 海東書院：（乾隆三十年）知府蔣允焄護巡道事，乃謀別建，擇地於寧南坊府學宮西崎下（與初址不同，初址在崎頂，迫近學宮），廣三十丈，袤八十丈，南向。講堂、學舍、亭榭悉具焉（《續修台灣縣志》卷 3，學志·書院）。

[92] 《續修台灣縣志》卷 1，地志·勝蹟。

[93]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上冊，頁 73。

[94] 盧嘉興〈蔣允焄擴建法華寺〉——《中國佛教史論集(八)台灣佛教篇》，頁 337。相關碑記（具收於《台灣南部碑文集成》）：重修關帝廟增建更衣亭碑記（乾隆三十年）重修天后宮增建更衣亭碑記（同前）重修龍神廟增建更衣亭碑記（同前）水仙宮清界碑記（同前）鴻指園記（同前）

[95] 見注 90。

[96] 《台灣南部碑文集成》上冊，頁 490。

[97] 又建半月樓其上（指半月池），端午之日，召妙齡妓女，衣輕綃，持畫漿，競渡於此，水花一濺，脂肉畢呈，太守顧而樂之。閩城男女逐隊以觀，極一時之盛。今樓已毀，池亦漸淤，寒葦荒畦，蕭然滿目，能不慨歎（《雅堂文集》卷 3，台南古蹟志·半月樓）。

[98] 《劍花室詩集》（《台灣文獻史料叢刊》第八輯），頁 105。

[99] 盧嘉興前揭文。